

洪惟仁先生訪問紀錄

(受難者)

受訪時間：2015年6月9日、7月7日

受訪地點：台北市臨沂街一角、桃園洪宅

訪問：薛化元

記錄：游淑如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

洪惟仁

職業／經歷

辭修高級中學教員

案件

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案

刑期

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6年，
實際服刑為6年8個月。

判決書年齡

27歲

與受訪者關係

當事人

案情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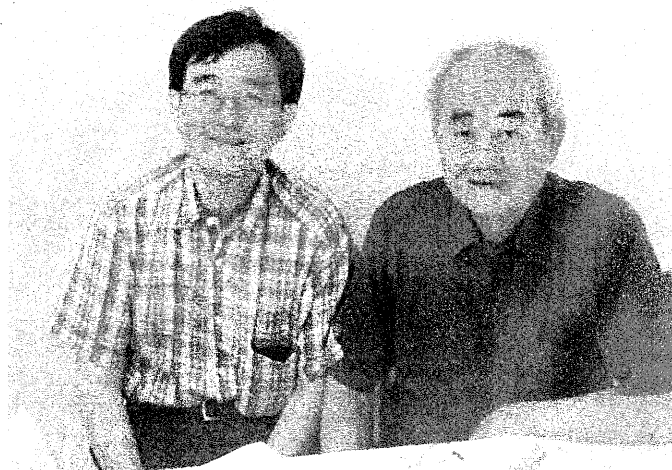
洪惟仁，於1946年6月19日出生，嘉義人。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等情治單位檔案指稱因涉「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案」*而被逮捕，後經判決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6年。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而獲減刑三分之一。自1972年9月16日被羈押，至1979年5月17日出獄，實際服刑6年又8個月。

- * 根據判決書提及，洪惟仁因不滿現實，於1972年4月間在其居所台北市木柵區二段161巷涵碧新村，與樊邦弘等人發起組織「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陰謀以暴力顛覆政府，同時藉任教台北縣私立東南工專機會，煽惑該校學生吳進發等人組織「大同軍」，陰謀以暗殺搶劫造成社會經濟混亂，印發傳單進行宣傳，冀達以武力推翻政府之目的，及與「匪」和談之幻想。參閱自台灣警備總司令部62年1月24日判決(62)初特字第29號、(62)蕨孝字第860號判決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受訪者簡介與本篇摘要

洪惟仁，於1946年6月19日出生，嘉義新港人。先後就讀於新港國民學校（今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嘉義中學、基隆市立二中（今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基隆省中、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就讀中國文化學院期間，認識了教授形上學的王競雄老師，彼此間會針對許多哲學、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話題進行交流，讓自己在思想上有了很廣闊的視野及新的體驗。後來王競雄搬到禪光寺的關係，機緣之下，認識了樊邦弘等人，聚在一起常常討論哲學、文學等話題，都一起受到王競雄反國民黨或不同程度左傾的影響。

後來一邊在師大研究所讀書、一邊在東南工專教書期間，受樊邦弘影響，決定和樊邦弘等人共同組織「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然而於1972年4月16日正式組完革命軍之後，實際上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規劃與具體行動，僅開過幾次集會後即自然解散。然而最終仍於1972年9月16日，在辭修中學教書課堂期間被調查局人員逮捕，先後被送至六張犁看守所、台北地方法院看守



【圖1】洪惟仁（右）與薛化元現場訪問照
說明：2015年6月9日游淑如拍攝。

所、新店軍法處看守所等單位，經過審問及判決下，因涉「陰謀以暴力顛覆政府、武力推翻政府」等理由而被判決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6年，並於新店軍法處看守所、綠島感訓監獄及仁愛教育實驗所服刑，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而獲減刑，故於1979年5月17日出獄。出獄後，歷經教日語、翻譯、研究撰寫著作、演講，又於中央研究院專做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工作，其後考取並完成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班學業，期間至靜宜大學中文系、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書，以及擔任創建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的首任系主任（2004-2009），2011年屆齡退休。退休後，專心進行著一生志業的語言地理學研究。

家庭背景

我出生於1946年6月19日，嘉義新港人。我阿爹的名字是洪恭亨，阿母叫做洪吳煖。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哥哥，下面有一個弟弟與一個妹妹。我阿爹公學校畢業後再去讀高等科，而阿母是公學校畢業後再去進修「產婆」的教育。相當於初中畢業，在那個年代屬於中上的教育程度。

我家在新港開一間布店，叫「振澤商店」。但我阿爹並沒有認真在做生意，他自己有組一個廣東樂隊，想像在我們玩音樂。我阿爹是個洋琴手，我小時候耳濡目染，也參加他的樂團，當一名木魚手。我阿爹除了音樂造詣不錯，也很喜歡畫圖和書法，我天生有畫圖、書法和音樂的藝術細胞，應該是他的遺傳。我小學時參加畫圖比賽往往是全校第一名。我的畫圖老師林惠美，她是我家鄉林玉琦醫生的女兒，她看我很有畫圖天分，就叫我晚上去她家學畫圖，她家很有錢，家裡的曲盤放的都是西洋古典樂。總之，耳濡目染下，我覺得對藝術很嚮往，有一次作文課寫題目為〈我的志願〉，就說希望將來成為藝術家。雖然後來我並沒有走上藝術家這條路，但小時候的音樂環境可能培養了我靈敏的聽覺，跟長大以後走向語音學、方言學可能有關。小學的繪畫訓練，雖然沒有繼續，但後來我坐牢時重拾畫筆，畫了很多水彩、粉彩、素描；又繪製台灣語言地圖，地圖的色彩很漂亮。從小打下的繪畫基礎也算是派得上用場。

我在新港國民學校畢業時，家裡的布店因為景氣不好，生意很差，不得不把店門關了。我阿爹跟阿母搬到台北找工作。那年我正好考上嘉義中學（今嘉義高級中學），我和哥哥倆就被寄養在在民雄農校（今民雄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書的大舅家裡。

我父母是先在台北中央市場擺攤子賣魚丸，但做了一陣子之後，賺不了什麼錢，我阿母有助產士資格，在徐婦產科工作了一段時間。剛好聯絡上一個名叫陳炯明¹的親戚，他是我外婆的堂弟，我們都要叫他叔公，他那時是台灣大學教授，而同時好像也在衛生署(2013年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工作的樣子，所以他就介紹我阿母去萬里衛生所當助產士。從此家裡的經濟才安定下來。

在基隆的求學生涯

在嘉義中學唸初一，寄居在舅舅家的這一年期間，雖然阿舅、阿姪很疼我們兄弟，但我感覺不快樂。一來從小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突然分開很想念父母親，二來小學五、六年時課業逼得很嚴，升初中以後沒有人管，太自由了，就放蕩了，天天跟太保學生玩在一起，成績很差，除了英文較好，差不多是滿江紅。於是覺得這樣混下去不是辦法，我就搬去萬里跟阿爹、阿母住在一起。

我重考，考上了基隆市立二中。基隆二中初一丙班是成績最好的班，因為初一唸了兩次，所以每個科目的表現都非常好，國文和英文都

1 陳炯明，1923年出生，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並前往日本鹿兒島大學醫學部攻讀醫學博士，回台後歷任台灣大學醫學院、台大醫院內科與國泰綜合醫院等職。參閱自〈中華民國醫界名人錄〉，《台灣當代人物誌(1946-1990)》，漢珍數位圖書檢索。

不錯，尤其是幾何最有心得，我解幾何題比老師還快，每次考試都100分，有一次考試最高分是150分，我也滿分，所以學期總平均超過100分，還是100分。不過我功課雖然很好但也十分調皮，特別喜歡捉弄女同學。我們班上還有一位同學也很調皮，有一次老師說他：「正皓，你要調皮搗蛋，要跟洪惟仁一樣也會讀書才行」。有一次因為太調皮了，惹了老師生氣，正好學校舉行幾何比賽，雖然我的幾何成績全班第一名，老師就是故意不讓我去參加。我就自己跑去教務處說我想要以個人名義報名，教務處說個人也可以報名參加。結果我得了全校第一名！

我另一項興趣是作文，當時愛上了文學，曾經是《野火》雜誌的通訊員，也寫過新詩，刊在《民眾日報》上。有一次作文，自由命題，我寫〈我愛颱風〉，被老師褒揚，到台上唸給同學聽。內容是說，我家住在海邊，有一次颱風警報，我們被疏散到山上借住在別人家，他們家有個女生，正好是我心儀的女孩，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做功課，感到非常幸福，以後非常盼望颱風再來。老師問我說是不是真的，我說不是，完全是虛構的。的確如此，其實我心儀的是我家對面雜貨點的女生，可是我一直都不敢表白。這篇文章出名了，以後每一次同學聚會，同學都還記得這篇文章。從此我就立志當作家。

基隆二中畢業後我考進基隆省中（今基隆高級中學），一進校就被分配到丙班直升班，同班同學都很優秀，也很用功。不過因為我迷上文學，自己寫小說，上課的時候，我沒在聽，埋頭寫小說，寫的都是愛情小說，其實自己從來沒有談過戀愛。功課越來越爛，大概是落到最後一、二名了。到了第二年就由原來的直升班丙班轉到普通班丁班。

轉到普通班之後，我在班上的排名變成前幾名了，反而變得有自信起來，壓力減輕，人也快樂起來了。當時身邊有幾個外省同學，那時外省第二代都會講家鄉話，我就跟他們學廣東話、上海話；還有一位從日本回來的台僑，我也跟著學日本話、唱日本歌。我本來就有語言天份，

英文成績是我較強的科目。從此我迷上語言，那時記性好，學的語言直到現在還記得。

我也注意到同學的台語有漳州腔、泉州腔，跟我的口音很不一樣，同學都笑我有「下港腔」，後來才知道東海岸如金山、萬里、九分仔、金瓜石仔，講的是古老的「老漳海腔」，而從七堵、汐止講的是安溪腔，後來被我正名為「老泉山腔」，我自己的口音屬於「新漳山腔」，這三種方言都保存著相當古老的閩南語特色。天天聽各種口音，加上我也發覺日語漢字音和台語、華語，各種方言有一種對應關係，覺得很奇妙，也因此開始自己看一些音韻學的書，摸索著台語的音韻系統和漢字音對應關係。

到了高三，同班有一位同學叫羅子玄²，跟我很要好。我常常去他家住找他一起玩，他爸爸是漢文先生，家裡有很多藏書，包括一些台語方面的書籍，我借了連雅堂編寫的《台灣語典》和《雅言》，還有一本張世祿的《中國音韻學》，這些書看了似懂非懂，但是越看越有興趣。那時自己對漢字音對應和台語本字很感興趣，有什麼發現就會跟羅子玄瞎扯，他是我的忠實聽眾。

有一次國文課寫作文，老師給我們自由命題，這是最喜歡的題目，可以讓我隨意揮灑，我就寫了一篇〈台語的音韻系統〉。我的國文老師王冬珍是河南人，他看了我的文章很特別，給我很高的評分，鼓勵我說：「你想研究台灣話，要去唸中文系」。那時候自己對中文系也沒有什麼概念，就問哥哥的意見，他剛好就讀文化學院中文系³第一屆，很鼓勵

2 羅子玄，1947年7月15日出生，基隆市人，因「羅子玄案／DC計畫案」而被逮捕，後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3年。參閱自台灣警備總司令部58年判決(58)初特字第0028號判決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3 設立於1962年，因先成立研究部而名為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年更名為中國文化學院，1980年改制為中國文化大學，而中國文學系成立於1963年6月，1969年分為文

我考文化學院中文系，他說他們學校的老師很多都是師範大學國文系的教授來文化這邊兼課，所以整體水準很不錯。我就決定考中文系。因為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分數不夠，我把文化學院中文系填得很前面，結果在1965年考上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的系狀元。

我也想過要去考師大美術系，但他們要考術科，我本身沒受過系統訓練，所以就只好放棄。我當時也想說家裡經濟不好，所以一開始是打算去考免學費的政工幹校（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那時也不知道政工幹校是什麼學校，如果我去考了，一定考取的。那樣，我可能變成國民黨的政工幹部，我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我的思想立場可能變成深藍，不會變成深紅或深綠。所以王冬珍老師的一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對她一直都心存感激，她算是我第一個恩師。我去過她家，那時她的兒子還很小。大約將近三十年前，我有一次語言調查，調查到南投縣仁愛鄉，有一位年輕人，知道我的名字，湊過來自我介紹說：「我是王冬珍的兒子程士毅。」我非常驚喜。我去王老師家看到的小孩子現在長大了。他是張炎憲教授的碩士生，碩士畢業後獻身於原住民運動，也娶了原住民為妻。他非常隨性，我覺得他的個性比原住民還原住民。後來我們變成好朋友，我擔任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主任曾經聘請他上過課，也合寫過一篇〈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2014）的論文。

學與文藝兩組。參閱自中國文化大學，網址：https://www.pccu.edu.tw/intro_about.html，引用日期：2020年2月19日。

中國文化學院的求學生活

不過進了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才發覺有點失望，對系裡的課程實在沒有什麼興趣，跟我的期待完全不一樣。老師上課的內容無法滿足我的求知欲，所以我很少去上課，我到處去旁聽外系、外校的課程。

我在外系交了一些天才朋友，如後來比較出名的像是蔣勳⁴、陳千武的兒子陳明台⁵，我們都常常聚在一起討論、辯論，互相腦力激盪，自己變得很愛看書，什麼書都看，什麼都有興趣。

4 蔣勳，1947年出生，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後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攻讀藝術研究所。回台後，歷任《雄獅美術》主編、廣播主持人、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聯合文學》社長等職。其著作有詩作、小說、散文與藝術論評等各類文體。參閱自「蔣勳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g/chiangxun1947/about/?ref=page_internal，引用日期：2020年2月19日。

5 陳千武(1922-2012)，南投人，本名陳武雄，戰後歷任於林務局與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主任等職，名詩人。他的兒子為陳明台，1948年1月22日出生，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文學研究所東洋史學組碩士、筑波大學歷史人類研究所東洋史學組博士，歷任台灣兒童文學學會理事、台灣現代詩人協會常務理事、台灣筆會理事，並任教於中正大學台文所、淡江大學日文系、東吳大學中文系與靜宜大學人文科等系所。參閱自「第六屆國家文藝獎得主——陳千武」，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官網，網址：<https://www.ncafro.org.tw/award-artist.aspx?id=1206>，引用日期：2020年2月19日；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頁328；「陳明台」，國立台灣文學館，網址：http://www3.nmtl.gov.tw/researcher/researcher_detail.php?rid=089，引用日期：2020年2月19日。

我旁聽的課程，如哲學系的毓鋆老師⁶、王競雄老師，外校有鍾露昇老師⁷的課，對我影響都非常大，其中王競雄老師和鍾露昇老師兩位影響了我的一生。

首先談鍾露昇老師。我認識他是經過我高中時代教我日文的徐清茂同學的介紹，他是輔仁大學中文系學生。鍾老師在系上兼課，他說鍾老師專門研究台灣話，於是我請他帶我去台灣師範大學拜鍾露昇為師，從此成為鍾老師門下唯一的旁聽生。我旁聽了他的語音學、聲韻學、方言學，他教我結構語言學。我升大二的暑假，羅傑瑞教授來台灣進行漢語及南島語調查，調查的地點在鍾老師的書房，我就在附近租了一間房，跟著他們學記音，我後來會做方言調查就是那時候訓練的。經過這些理論與實務經驗，使我走上語言學研究的不歸路。鍾露昇老師是台灣地理語言學的開山祖師，他的國發會研究報告《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⁸調查台灣閩南語變體的分佈，並繪製地圖，是第一份台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我後來研究地理語言學，繼承了他的衣鉢。我大三的時候，鍾老師去美國讀語言教學博士，其後滯留美國，終生教授漢語及中華文化。他回國只有4年，我變成他在台灣唯一的語言學傳人。

6 毓鋆(1906-2011)，愛新覺羅氏，清朝皇室後裔，來台後，任教於台東農校(今台東專科學校)、中國文化學院、輔仁大學、政治大學等校，後於1971年創辦了天德齋舍(後於1987年改為奉元書院)，是為著名儒家學者。詳情可參閱黃忠天《溯源與奔流——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院教育》，《漢學研究通訊》32：1(2013年2月)，頁38-49。

7 鍾露昇，1927年6月出生，字希亮，福建惠安人，畢業於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並於美國喬治城大學研究語言學，後獲得美國西雅圖大學教育碩士、華盛頓大學教育博士，曾任職於《國語日報》與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參閱自介紹鍾露昇中華文化研習中心，網址：<http://gator.uhd.edu/~chong/cclc/jieshao.htm>，引用日期：2020年2月19日。

8 鍾露昇，〈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研究報告，1967)。

王競雄老師更是影響我命運的關鍵人物。我從大一就去聽他形上學的課，他自己除了中國哲學之外，對西洋哲學、佛學與道家思想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自己的碩士論文〈歷史渦旋論〉⁹，內容就是論述歷史都是英雄所創造的，英雄是歷史漩渦的中心，主宰著歷史的走向。我從小接受蔣家英雄主義的教育，看過很多日本武士電影，這樣的英雄理論對我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當時我雖然沒看過他寫的碩士論文，但是聽他的介紹再加上看過他一些其他短篇文章，也開始覺得自己是天才、英雄了。我曾經在文化學院創辦了一個「語言社」的社團，表現了我的影響力和組織力。這些表現更使自己以為自己是天才！是英雄！大學的時候，我也曾經在學生自己辦的學報裡發表一篇有關英雄論的文章，而那篇文章剛好可以反映我在大學期間的英雄主義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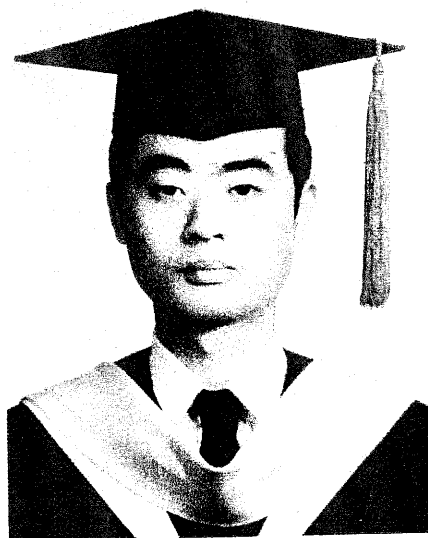
在哲學系聽了一些哲學課，我的思想開悟了，學習力、領悟力突然被開發出來，興趣非常廣泛，語言學、哲學、邏輯學、集合論、心理學、物理學、美學、天文學、氣象學、歷史學、地理學，什麼書都看，而且專挑一些硬梆梆的書看。

到了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王競雄老師說他不想繼續教書而想要離開學校去山上專心寫書。但他辭掉工作之後沒有收入，毓鋆老師願意資助他每個月500元生活費，並交代我把錢親自拿給他。藉由這樣的機會，我就固定每個月去獅頭山的尼姑庵裡找他，每次一見面就開始天南地北的聊哲學，聊到天亮，睡覺睡到中午才離開。這樣的情形大概維持了兩年的時間。畢業後去當兵還是每個月去找他。

總之，在大學這段時間是我目前心靈感到最滿足，生活過得最多采多姿的日子，覺得在人生中從此開拓了一個很廣闊的視野，對我的未來人生影響非常大。

9 王競雄，〈歷史渦旋論〉（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66）。

我1969年文化學院畢業後去當兵一年，那時候自己被分配到新兵訓練中心，前後跟著單位換了兩、三個地方，其中一個地方在大林（嘉義縣）。不過也很幸運，調來調去的訓練營都剛好沒兵，大約有半年時間都閒著。王競雄老師常常跟我談物理哲學，說他想要寫「科學哲學」理論的書，我受到他的影響，也看了很多物理學、天文學方面的書。還曾經想乾脆重考物理系，不過後來想一想，這條路未免太遙遠了，就打消了念頭。1970年當完兵之後，我考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圖2】洪惟仁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照 說明：洪惟仁提供。

台師大國文研究所時期

就在進入研究所就讀前的那一個暑假，我去找搬到禪光寺的王競雄老師，並且和他一起住了兩個月。在這期間我又有了新的體驗，王老師開始跟我談有關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那時候正好文化大革命（1966-1976）鬧的正兇，他覺得毛澤東跟紅衛兵很了不起，有辦法號召全國青年鬧革命。這些是我們過去沒有談過、也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話題，對我是很大的震撼。從此我的思想開始左傾，幾乎完全接受了他的觀點。



【圖3】洪惟仁（右二）與王競雄（中）、陳瑞麟（左一）、曾健民（右一）在禪光寺
說明：洪惟仁提供。

當時禪光寺來了幾個天才青年，如陳瑞麟、曾健民、樊邦弘等。我們本來都互不認識，因緣際會，聚在一起，常常討論哲學、文學等話題，互相間不太談政治，但是都一起受到王競雄反國民黨或不同程度左傾的影響。

陳瑞麟後來以陳列做為他的筆名，成為一位知名的散文家，並且當過花蓮的國民代表¹⁰。他離開禪光寺之後，因為對學生批評國民黨政府，

10 陳瑞麟，筆名為陳列，1946年3月22日出生，嘉義人，因「陳瑞麟發表利匪言論案」而被逮捕，後經判決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權4年，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而減刑，故實際服刑為4年8個月。出獄後從事創作與翻譯，其作品有《地上歲月》、《永遠的山》與《躊躇之歌》等書，並歷任民主進步黨花蓮縣黨部主委與國民大會代表等職。參閱自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62）初特字第0002號判決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學生受到他的思想影響也有反國民黨政府言論，因而被逮捕，以「為匪宣傳」罪名被判7年。我們離開禪光寺以後就沒有聯絡，第二次見面竟然是在新店看守所外役監，並且我們在縫衣工廠比鄰而坐，晚上又住在同一監房，未免太有緣了（詳下「外役監生活」）。

還有一位曾健民，一個文藝青年，喜歡談自己的創作〈壓下的山影〉，離開後就沒有再聯繫，他後來去日本習醫，回國當齒科醫生，後來成為統派左傾的理論家。

當中和我去坐牢最關鍵的人物是樊邦弘¹¹。他後來自己創業，創立「真明麗」燈飾公司，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家。他來禪光寺住的原因是因為高中讀到留級，心情不好，跑到寺裡靜養，沉澱自己。我跟樊邦弘很有話聊，這個孩子很聰明，我跟他講什麼，他一聽就能夠領悟。他因為受到我和王競雄的啟發與影響，變得很有思想，很喜歡讀書。他受到王競雄的左傾思想影響更深，比我更激進。

我回學校就讀研究所以後，王競雄離開禪光寺搬去大崗山的一間廟裡，他也是說要去專心寫書，但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沒有寫出什麼書，只是一天到晚胡思亂想。我們不談哲學了，談的都是毛澤東領導革命，救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多麼偉大。1971年台灣剛退出聯合國，國際局勢對台灣越來越不利，他認為是和中共和談的時機。他曾經寫信給蔣經國，請他和中共和談，蔣經國當然不理他。既然如此，他認為那正是發動革命的時機，逢人便談。這些動作當然在國民黨的監視之中，最糟糕

藏；「台灣文學作家系列」，中央廣播電台，網址：http://cn.rti.org.tw/ajax/recommend/Literator_content.aspx?id=21，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

11 樊邦弘，1953年9月12日出生，四川簡陽人，與洪惟仁同因涉「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案」而被逮捕，後經辦理「自首手續」而無罪釋放。詳情可參閱本書〈樊邦弘先生訪問紀錄〉。

的是他身邊有一位柯安正老師，其實就是國民黨的內線，他都渾然不知。

我從禪光寺回來之後一邊在師大研究所讀書，一邊在東南工專（今東南科技大學）兼課，生活變得非常忙碌。更重要的是發現王老師講的都是一些不著邊際的話，話題越來越遠，於是就漸漸的不想去找他，而減少與他見面的次數。不過那時樊邦弘到台北來唸強恕中學（今強恕高級中學），但還是一樣很常去找王競雄老師。大概是這段期間，樊邦弘受王競雄老師的革命思想影響而更加激進！



圖4 洪惟仁（左一）與樊邦弘（中）在禪光寺
說明：洪惟仁提供。

涉案情形

王競雄老師在大崗山積極宣傳革命，一見面就談他的軍事政變計畫，他認為只要他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一定會鼓動革命風潮。他甚至叫我去找一位他的老長官，記得是住在新屋的顏珍珠將軍，鼓舞他起來

革命。當時我沒有想太多，只因王競雄是我的老師，他交代我去聯絡什麼人我就照做。我記得那次到了新屋已經是黃昏的時候，好像沒有見到顏將軍的面，把信留下來就離開了¹²。除了顏將軍，王老師沒有叫我再聯絡其他人。

我雖然受到王競雄老師的影響，思想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贊成革命，但從來都沒有想到要搞真的。因為，一來我對文化大革命並不了解，二來我爸爸雖然曾經在萬里煤礦當過工人，但當時我們家境還算過得去，我對所謂無產階級的處境不是很了解。我也不覺得當時有革命的條件。

樊邦弘的父親是軍人，更沒有條件反國民黨，但受到王競雄老師影響，不但傾向中共，思想更激進。有一次我跟他談馬克思主義，他不滿地說：「光說不練，有什麼用啊！我們要行動、要起來革命啊！」我聽他這麼一說，感到非常羞愧。

12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1971年夏天洪惟仁曾往南部訪晤王競雄，王談及時事問題時說：「我已寫信給蔣院長，要求蔣院長負起和平統一的責任，與中共和談，如蔣院長不聽我的勸，我們次一步驟便要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後，由我們代表台灣與大陸和談。」洪惟仁受王競雄這種思想影響，促使他決定組織「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要以武力革命的手段來達成王競雄理想。此外，王競雄意想中的第一次軍事政變計畫告訴過洪惟仁與樊邦弘二人，其構想是將台灣劃分為若干區，北區以衛戍師為主，中區以兵團為主，南區以裝甲兵為主，首先預計說服老長官現任台中二兵團副司令顏珍珠將軍，再由顏說服衛戍師，嘉義方面則說服張明善旅及易自強上校，首由衛戍師發動占領台北市交通要衝、電台等重要處所，南部部隊及裝甲再響應，並令寄信給黃琪璘，意圖透過黃的關係認識並拉攏高玉樹。經洪惟仁聯絡結果，張明善、顏將軍、易自強、黃琪璘等均未得到消息，因感計畫難以實施，遂放棄軍事政變構想與計畫。（後來調查：顏珍珠將軍、易自強上校、張明善旅等人均為王競雄過去的長官，基於往日袍澤之愛對王競雄偶有接濟，談不上有深厚關係，至於王競雄幻想軍事政變計畫彼等均不知情，亦未與王見過面，完全出於其一人幻想。）參閱自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台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73），頁257-260。

從那天開始，我開始策劃革命，計劃組織「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所謂「大同主義」就是孫文所提倡的大同理想，其實換個說法也是共產主義的意思。我把樊邦弘叫過來，他都贊成，只要革命，怎樣革命都好。

當時加入這個組織的基本成員有樊邦弘及他的朋友林振丞，另外我吸收了我在東南工專的五名學生以及陳杭升。陳杭升是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¹³的研究生，那時我住在政大附近的涵碧新村，陳杭升是同一房東的房客。但後來聽人家說才知道他是調查局線民，這個組織就是他報上去的，我出獄後又聽說升任為台南調查局主任¹⁴。

1972年4月16日，我把所有革命同志召集起來正式開會，大家圍坐在一起並默念組織的誓詞，歃血為盟，正式成立了「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¹⁵。

13 1969年改為「民族社會學系」，同年成立「邊政研究所」，1981年民族社會學系改名為「社會學系」，而1990年邊政研究所更名為「民族研究所」，另1993年新設立「民族學系」，1996年原民族研究所與民族學系合併，統稱為「民族學系（學士班與碩士班）」。
參閱自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網址：<http://www.ethnos.nccu.edu.tw/institute.asp>，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

14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1972年4月3日晚上7點，邀我（羅航）前往木柵路二段涵碧新村其住所談話，洪惟仁說他要搞共產革命，在台灣搞爆動，因為目前國際局勢越來越對我們不利，中共早晚會來接收台灣，如果等中共來接收，毋寧我們先來推翻政府，然後與中共作談判基礎，希望我參加他們組織。1972年4月6、7日，據台北市處報稱本處工作關係羅航（化名）於報稱發現就讀師大國文研究所研究生洪惟仁發起叛亂組織推翻政府。參閱自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頁254。

15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1972年4月16日上午10點，羅航經洪惟仁邀請至其木柵住所，當時發現還有樊邦弘、林振丞等也在，大家圍坐一方桌，默念該組織誓詞，隨後各人用刀片劃破拇指，將血拭在衛生紙上燒掉，即算完成加入該組織的宣誓手續。組織誓詞內容為：（1）我信奉大同主義，且願服從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的領導（2）願為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奉獻自己的生命（3）我愛人民高於一切（4）對本組織祕密願終身守之。參閱自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頁254。

我像招保險一樣，到處招募成員，不過拒絕我的也非常多，至於找過誰已經記不太清楚了¹⁶。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次想要吸收我一位初中同學，我同學聽了就勸我千萬不要衝動，他說：「羅子玄（前面提及的高三同學）都已經被抓進去了，你還不怕！」但怎麼說，我還是一意孤行。當時我就像毓璽老師給我們說過殺蛇的故事一樣，他說要殺蛇，只要把蛇弄到一個管子裡，那蛇鑽進去之後，只要把刀對準喉嚨一插，那條蛇越痛就越往前爬，結果就漂漂亮亮地被剖了。我就像是那條蛇，明知道去送死，但還是勇往直前。

有官方檔案說這個革命軍組織是由王競雄老師領導的，這不是事實。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過。當初我們要組這個組織，並沒有跟他商量。我曾經到大岡山跟他報備過，他也沒有說一句話，總之各搞各的¹⁷。就是說，他跟我們的組織實際上完全沒有關係。¹⁸

那時候我們有談到要怎麼顛覆政府，例如先暗殺資本家或是搶劫銀行籌組經費。但我們誰都沒有想說要當什麼領導人，單純就只是想要當一位放火人，只要放了火之後應該就有人會跟著響應，這樣我們的目標就算是達成了。不過，這些想法都只在策畫的階段，連要殺哪位資本

16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洪惟仁當時對大家講今後本組織中若有人犯過錯，將採自我批評並接受大眾鬥爭方式處理。說完即自我批評說，曾經企圖吸收一位女同學朱洪加入組織被拒，因此雖未洩漏太多祕密，但已被朱女了解少許動向，此為不智之舉，願自請各位同志刮一耳光。於是在座輕刮洪惟仁的面部以示懲罰。參閱自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頁254-255。

17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1972年8月間，洪惟仁攜罐頭到大岡山看王競雄，說他已經組織起來了，並說罐頭是組織送的。當時王競雄把他趕出去，未問其組織情形，東西亦未留下。參閱自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頁260。但此次訪談問及此事，洪惟仁對此事完全沒有印象。

18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今後本組織由王競雄指導，我（洪惟仁）等皆是核心都負外圍之責。最後宣布本組織今後每星期日上午10點在其住所集會。參閱自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頁255。

家、搶哪家銀行我們都沒有概念，更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

我在東南工專吸收了幾位學生，像是彭茂松、吳進發、陳建順、蔡正右與陳天興等人¹⁹，他們一開始衝動加入這個革命組織，但後來覺得有點害怕，說我們革命不會成功的啦，不要搞了！我看大家沒有信心，又審視當時的時勢，所以也贊成放棄革命，大家保守祕密就好。但陳杭升卻鼓勵我們「不要灰心！繼續努力！」於是我們沒有決議解散。不過也沒有繼續開會，組織也自然流產。我們從頭到尾才只開會過兩、三次而已，並沒有任何具體行動。只是沒想到，悲劇還是發生了！

逮捕前後的經過

得到碩士學位之後，我到辭修中學教書。1972年9月16日早上，我在講課的時候有人進來跟我說有客人要找我，叫我趕快過去。當下我突然湧上一種不幸發生的預感，不過還是回說下課後再過去，淡定地繼續上課。

一下課我就看到一群調查局的人在等我，表明身分之後，要我帶他

19 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報告提及，涉案人有洪惟仁（10年）、樊邦弘（自首）、林振丞（自首）、曾建民（交由空總政四處處理）、彭茂松（交由該校加強輔導考核）、吳進發（交由該校加強輔導考核）、陳建順（交由該校加強輔導考核）、蔡正右（交由該校加強輔導考核）、陳天興（交由該校加強輔導考核）、柯安正（為警備總部布置之內線，由保安處領回）、金行天（約談後飭回）、王競雄（會同警備總部偵辦由警總移送法辦）等12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印，《要案紀實（第1輯）》，頁261-263。

們到我的宿舍。一到宿舍，他們就熟練地自己把門鎖打開，把我所有的東西搜刮而去。他們先把我抓去和平東路一帶的六張犁看守所²⁰，到了那個地方之後，調查員一開始就告訴我：「你要實話實說，坦白從寬，政治解決。如果不老實，只有法律解決。」我問什麼叫「政治解決？」調查員說：「你們都是有理想的青年，一時糊塗也是難免，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們做的事可能自己都忘了，但是我們都有紀錄。從實招來，不要隱瞞。老實交代清楚，就可以馬上回去教書。」我心想，我們只是說說而已，又沒有什麼具體行動，應該不會有什麼事。既然調查員都這麼說，所以問什麼，都實話實說，毫無隱瞞。他們問我：「為何要組織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我解釋說：「國父也說民生主義的理想是大同世界，讓我們一起為大同主義理想而奮鬥啊！」他們聽了笑說：「你要吸收我們加入你的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嗎？」

革命策畫的過程問完之後，接著一直問我有關王競雄老師的事情，我只能說知道的，其餘我不知道的，再問也說不出來。後來還問我有關華岡詩社²¹的事情，問說成員有什麼人、什麼人認不認識？問我有沒有參加？根據他們的資料「華岡詩社」是台獨組織。我回說那個組織只是個單純的文學組織，而且我也不是裡面的社員，那個社團的成員我只認識同班同學龔顯宗²²，他沒有什麼台獨思想。但偵訊的人一直要我承認我

20 六張犁看守所，其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偵訊室之一，位址於台北市臥龍街240-1號，後為海岸巡防總局人員研習中心（門號為台北市大安區臥龍街240-2號）。參閱自黃龍興，〈於負面遺產中重構創傷記憶——從奧斯維辛博物館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7（2011年9月），頁73-88。

21 華岡詩社，原為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文化分會的詩組，後於1968年由林鋒雄提議將詩組的人獨立出來組成詩社，並邀集陳明台、龔顯宗等成員共同發起。其於1968年3月5日正式獲中國文化學院核准成立，並先後發行《華岡詩社通訊》與《華岡詩刊》。參閱自楊宗翰，《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台北：新銳文創，2012），頁212-213。

22 龔顯宗，筆名龔敬、恭敬與龍光，1943年9月23日出生，嘉義朴子人，中國文化大學

跟他們有什麼政治關係，華岡詩社是不是台獨組織。後來才知道是我們同班中有一名同學是國民黨線民，這個人沒有什麼才氣，也沒有參加過華岡詩社，大概為了成績，隨便亂咬。

就這樣，同樣的幾個問題反覆問了我好幾天，調查員一個一個進來接替輪流問話，一直不讓你休息，不斷的拿菸給你抽，也不怎麼拿水給你喝，簡直就是疲勞轟炸。

後來我跟老獄友說起，才知道這是調查局一貫的技倆，每一個人進來都被這麼騙了口供，但是沒有一個人被放出去。疲勞審問還是小巫見大巫，很多難友在調查局或在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裡，因為被問到沒有什麼交代了，被刑求得死去活來。我在看守所，幾乎天天聽到刑求的叫喊聲，那時候簡直活在恐懼之中。我沒有被刑求算是最幸運的。

有一件幸運的事是，我在六張犁看守所裡遇到一位文化學院的學妹，她是外省人，我在學校跟她並不認識，不過因為我在大學時代小有名氣，她說認識我。有一次她輪班來看我，帶來兩個月餅給我，問我說：「中秋節到了，你不想家嗎？要不要寫個信回家？」我自從被拘押以來，天天活在恐懼、煩惱之中，從來沒有想過家人也許比我自己更恐懼、更擔心。經她這麼一問，我第一次想到家，英雄主義突然崩潰，眼淚像河水決堤一樣，哭了起來。

她剛畢業就進入調查局工作，剛好又遇到我這個案子。也許是同學情誼，也許是菜鳥調查員，不知保密。我從她的口中，知道了誰是出賣我們的同志，誰是密報的同學。我雖然知道每一個班都有國民黨的特務，但是並不知道誰是特務。這一下子，我全知道了，原來我們身邊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任中興大學、靜宜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與台南師院（今台南大學）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職。參閱國家台灣文學館，網址：http://www3.nmtl.gov.tw/researcher/researcher_detail.php?rid=152，引用日期：2020年2月18日。

到處是特務，有些還是你的好朋友、甚至是同志，你隨時都可能踩到地雷。

問到最後沒有話問了，我被送到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²³仁舍。很少來提訊，我要求看書，他們給我一本蔣經國寫的《風雨中的寧靜》，我請哥哥寄給我《易經》，在那裡兩個月，我在骯髒的牢房裡，藉著昏暗的10燭光，把兩本書看完了，《易繫詞》背得混瓜爛熟。易經哲學是中國的辯證法，利用這兩個月沉思，我對易經的辯證法有了深刻的體悟，對我後來的思考方法和治學方法有根本的影響。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員來了。我問他們說：「你們不是說只要我實話實說就要放我回去教書，我什麼都交代清楚了，什麼時候放我回家？」調查員說：「你沒有交代清楚，沒有辦法放你回家。你去跟檢察官說好啦！」在六張犁待了兩個月左右，在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仁舍也待了兩個月左右，這次是被送到新店軍法處看守所（位於今國家人權博物館）。

在新店的軍法處看守所同牢房裡的難友都是外省人，並且都是公務員或教員。其中最多的是福建人，尤其是惠安人，他們都是因省教育處長駱神助被牽出來的²⁴，只要是同學、認識的人全部抓起來，抓起來就打，打得受不了，就被迫咬來咬去，全部是冤案。一位同房的校長，天

23 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於1952年與台北監獄分立，1980年7月因應審檢分隸而改為台灣台北看守所，而台北看守所原設立於台北市愛國東路1號，自1975年遷至台北縣土城鄉（今新北市土城區）。參閱自法務部矯正署，網址：<http://www.tpd.moj.gov.tw/ct.asp?xItem=1465&CtNode=4719&mp=076>，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

24 駱神助，1917年7月7日出生，福建惠安人，1946年來台後，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第三科地方教育行政股工作，後因「駱神助案」而被逮捕，經判決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1976年保外就醫，1990年總統特赦，故實際服刑為4年3個月又20日。詳情可參閱高素蘭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駱神助案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2008）。

天哭，拿著家書，一面看一面流淚，但我看了並不想哭。其他的人看了也沒有人勸他不要哭，我看每一個人的眼淚都流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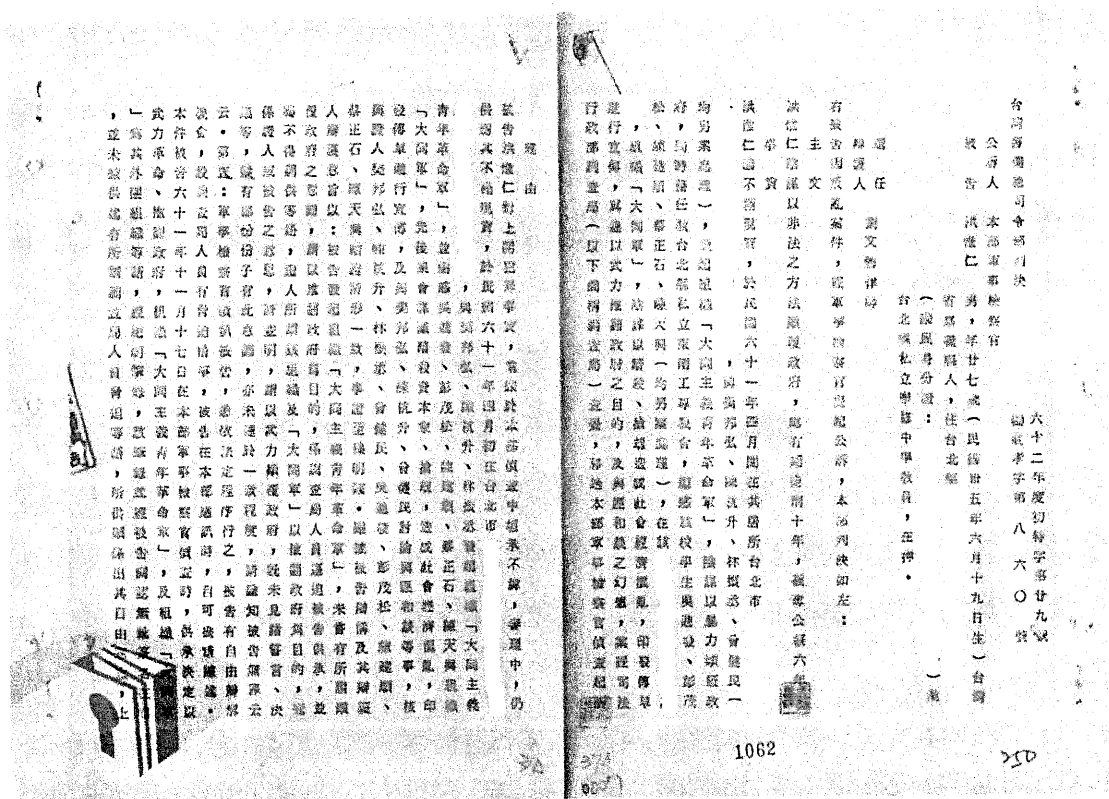
每天上、下午的放封時間，不止是運動時間，更是交流時間。大家繞圈子散步的時候，我是比較沉默，但有些人會一面走一面聊天，互相打聽牢裡關些什麼人、什麼案子，有些人也會在房與房之間傳紙條，通風報信。聽說消息最靈通的是李敖²⁵，哪間房關什麼人、什麼案子，他都瞭如指掌。李敖都是一個人放封，有一次人家告訴我，樓下放封的就是李敖。我爬到窗邊一看，果然是李敖，我們互相揮手示意。就這樣一面之緣，沒有講過一句話。大約10年後我出獄後幾年，我住在蘇秋鎮家，替他寫立委選舉書，李敖來拜訪。他一見到我立刻認出我來，叫我「洪先生，好久不見。」他的博學多聞，過目不忘，當場見識了。

在等正式開庭之前，他們有問我要不要請律師替我辯護，我說好。我哥哥後來跟我說，我這個案子就算請大律師也沒有用的。不過身為哥哥，如果沒去幫我請律師也過不去，所以還是幫我請了一位律師來。說實在話，不論是起訴書、判決書，都是調查局說了算，檢察官、法官不過是照章行事，抄抄寫寫，然後再蓋個章，你的命運就被決定了，請律師只是浪費錢而已。

宣判的時候，審判長說：「洪惟仁，我們算你最便宜的，只判你10年。」我回問法官一句話：「我又沒有做什麼，為什麼要判我10年？」法官回說：「好在你沒有做什麼，假如你真的有做什麼就唯一死刑了！」我是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三：「意圖叛亂，而未著手實施者處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定罪。照這個條例，10年真的是最「便宜」

25 李敖(1935-2018)，吉林扶餘縣人，因「花旗銀行台南美新聞處爆炸案」而被逮捕，後經判決有期徒刑8年6個月，褫奪公權6年，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而減刑，故實際服刑為5年8個月，褫奪公權4年。參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64)諫判字第0049號判決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的。後來進了外役監，才了解到凡是二條三判刑的，的確都是10年以上，15年以下。只有第七條所謂「為匪宣傳」的才判7年。早期進來的，很多人判死刑、無期徒刑。難友一聽到判無期徒刑，還要恭喜你哩，當年15年算最幸運的。



【圖5】洪惟仁的判決書 資料來源：台灣警備總司令部62年1月24日判決（62）初特字第29號、（62）威孝字第860號判決書。說明：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服刑生活

外役監時期

正式判刑之後，我被移送到同一個監所的外役監去做外役。我第一個要找的是高中好友羅子玄。我一進新店看守所心中就默唸著：「子玄，我來矣！」進來之後，一直都打聽不到他的消息。我心想大概關在外役監吧，可是進了外役監一打聽才知道他已經送綠島了。後來我到綠島，跟他不同監區，所以也無緣見面，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不過最意外的是，竟然跟我在禪光寺認識的好友陳瑞麟同房，而且在縫衣工廠工作時，也是鄰坐，真正有緣。那時我們主要是做運動褲，但因為我的手藝很好，所以班長就另外包一些西裝給我做。不過我多做這些，班長並沒有多給我錢，我是白白替班長賺外快了！

在外役監認識了很多朋友，特別是「成大共產黨案」一大群年輕人。他們大部分在所衣部，放工之後，大家玩在一起，聊天、彈吉他，有時會利用洗衣部的熱水沖一些海帶來吃，那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日子。

除了工作之外，我大部分就利用晚上大家在下棋、聊天與睡覺的休息時間，認真看書。我被判10年的當下，就對自己說：「你關得了我的身，關不了我的心，你關我10年，我要賺20年回來。」所以我就趁空閒時間，認真讀書。另外，利用這段時間好好鍛鍊身體，有些人坐牢就真的「坐」著不動，結果不是坐胖了，就是坐痔瘡了，有些人受不了孤獨，發瘋了。但我的身體很好。

我主要讀有關哲學、歷史跟地理的書。我請哥哥買了張其昀的《中

華民國地圖集》和《世界地圖集》各五大冊²⁶來。每看到什麼地名就查地圖。比如我讀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每看到什麼地名就立刻查地圖，所以斯坦因經過什麼地方，我都有空間的觀念，了解他整個探險過程。愛看地圖變成我的習慣，至今如此。我從小愛畫圖、初中愛幾何，後來愛上地理語言學，我喜歡的都跟「空間」有關。

外役監差不多是五、六個人關一間房，牢房晚上都不關門，相較之下比較自由，還有蚊帳。趁別人睡覺，我就躲在蚊帳下看書。雖然燈光比較亮，但是大約20燭光的日光燈，不是很亮，所以看書看到眼都花掉了，後來眼睛發痛，跟班長說要到外面去就醫，班長帶我出去看了兩次眼科，醫生說是角膜炎。角膜炎不是什麼大病，但是必須持續就醫，第三次班長就不帶我出去了。班長說照規定沒有生命危險就不能出去就醫。但我眼睛發炎得很厲害，縫衣服時把一個針看成兩個針，實在是沒辦法繼續做工了。後來眼睛自然好了一點，但因為沒有立即治療就變成了閃光，班長也不帶我出去配眼鏡。我的眼睛模糊了，針線穿不準，沒有辦法車衣服，我就跟班長說自己沒有辦法再工作了，於是他們才答應讓我養病休息。但休養不到一個月就把我送到綠島去了。同外役監有很多年輕力壯的、有生產力的都沒有送綠島，留在新店。送綠島也好，我們常笑那些沒有去綠島的人「坐牢經歷不全」。如果我的眼睛沒有壞了，我一定也是經歷不全吧。

26 張其昀編，《中華民國地圖集》（台北：國防研究院，1959-1967）；張其昀，《世界地圖集》（台北：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學研究所，1965-1973）。

綠島時期

我們被送到綠島的過程中，一開始先搭遊覽車到基隆，到了基隆再坐船到花蓮。本來是想要直接送到綠島，但是因為綠島海風太大不能靠岸，所以只好再折返回花蓮。那天晚上就先在花蓮休息，隔天再換坐遊覽車送到台東，到了台東之後再坐船到綠島。

在花蓮休息的那一晚，我們住在類似營房的地方，至於詳細地點在哪，我不太清楚。那天晚上是我被逮捕後第一次見到王競雄老師，在跟他打招呼前，已經聽很多人說他人已經有點瘋了。但我還是上前跟他問好，不過當時的他都沒有什麼表情，只是用很冷漠的表情與口氣抱怨我以前的事情，對我說類似那些「我對你很失望」、「你跟我已經沒關係」之類的話。我就問他為何對我有這樣的想法？他說了兩個理由，有一次，我們約在台北市衡陽路上的一間水果行還是咖啡廳裡，到了見面的時候，他說我沒有站起來跟他表示禮貌，非常不尊重他，但我試著回想一下，腦海中實在是沒有如他所說的那種記憶。第二個理由是他認為我是個台獨分子。他是位大中華民族主義很強的人，他支持共產黨的原因主要是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但我其實對大中國民族主義沒有興趣，我比較關心台灣。此外他對台灣沒有什麼好印象，例如他會說台灣女人沒有氣質，是因為台灣人沒有文化。我聽到就會跟他辯論起來，也因為我這樣跟他爭論的態度，讓他覺得不舒服。我後來在猜想，說不定他一直都不知道出賣他的是別人，反而認為我是出賣他、害他被逮捕的人。這次見面之後，我跟王競雄老師的緣分就真的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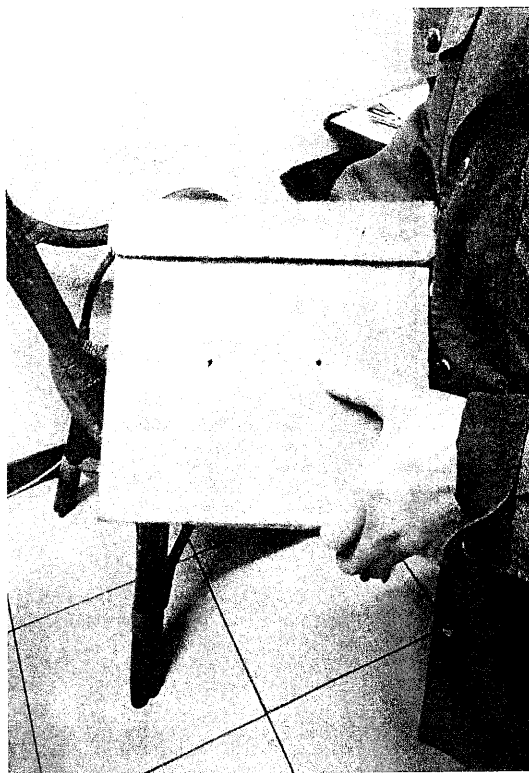
到了綠島政治犯監獄，我帶的書，每一本都要經過檢查，並被蓋上「毋忘在莒」的印章。不過只要有牽涉到「台灣」的就會被沒收，我曾經

帶一本張炫文的論文〈歌仔戲的音樂研究〉²⁷進來，管理員看到「歌仔戲」三個字就認為跟台灣有關，我的那本書就這樣莫名其妙被沒收了，到我出獄以前都沒有還給我。

由於當時我的眼睛壞了，所以不太能夠看書，我就開始過著「琴、棋、書、畫」的生活。

所謂「琴」就是彈吉他。有一次媽媽到綠島來看我，專程帶了一把吉他來給我。於是我跟吳約民前輩學古典吉他，我學到可以自己看譜彈吉他。

所謂「棋」就是下象棋，以前不太會下象棋，在牢裡無聊，難友們喜歡下棋消遣。沒有桌子可以下棋，就買「蔗粕仔枋」(tsiah-phoh-á-pang，蔗板)來，用原子筆尖頭一筆一筆的割成一塊一塊板子，再把內衣撕成條，用漿糊黏成箱子，最後貼牛皮紙，就變成一張漂亮的箱子，箱子還分成一格一格，每一格都有抽屜。這個箱子也可以當成桌子，可以寫字、下棋。我還做了一個小箱子，當坐椅。另外我也做了一個吉他盒，裝吉他。出獄以後，桌子留下來送人，椅子和吉他盒帶回家。剪蔗粕仔枋做桌椅不是我的發明，是前輩留下的綠島監獄文化，我是向難友學的。



【圖6】洪惟仁於獄中所做的椅子
說明：洪惟仁提供。

27 張炫文，〈歌仔戲的音樂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5月)。

圖7、圖8 洪惟仁於獄中之畫作

說明：圖7是根據其母親相片臨摹的鉛筆畫，
圖8為洪惟仁臨摹的水彩畫；洪惟仁提供。



【圖7】



【圖8】

所謂「書」指寫毛筆字，這方面我是遺傳了阿爹書法的才氣。現在家裡面還掛著阿爹寫的對聯「爭利應爭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我受阿爹的影響非常深，我從6歲就開始跟阿爹學寫毛筆字，後來斷斷續續在寫，在綠島沒事幹，就更認真練字。

最後所謂「畫」就是畫水彩、粉彩或是鉛筆畫，我畫了很多水彩，大部分都是臨摹，有些還留著；我也畫了很多素描，大部分送人，我20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幅人畫像，畫完就送給他，有些是看照片臨摹。

此外，我還在牢裡練瑜珈做運動，我自己看書學瑜珈，我的身材很好，出獄時胸圍42英吋，腰圍29英吋。結婚以後腰圍就一年加一吋了。

我高中就開始學日文，一直沒有間斷。在綠島，我跟林書揚²⁸前輩學日文，楊鴻儒²⁹前輩也教了一點。我在獄中的日文教材是幾本日文畫冊。我一面學畫，一面學日文。林書揚前輩的日文非常好，而且非常博學，他還教我用日語吟漢詩。

一天中最輕鬆的是，每天早上跟下午各一小時放封的時間。大家各自可以找志同道合的人散步、聊天。我的思想本來偏向左派，所以一開始跟陳映真與林書揚比較常在一起。但我跟獨派也保持良好的關係。在牢中遇到一位比較能聊的獨派是顏尹謨³⁰。有一次我跟他聊天聊到

28 林書揚(1926-2012)，台南麻豆人，因涉「省工委會台南縣麻豆支部謝瑞仁等案」而被逮捕，後被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實際於1984年出獄，出獄後歷任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黨、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與中國統一聯盟等職務。參閱自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上冊）》，頁60-64；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2）。

29 楊鴻儒，1930年3月19日出生，台南人，因「楊鴻儒案」而被逮捕，後經判決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6年，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而減刑，故實際服刑為7年8個月。參閱自國防部判決（61）教公字第0009號判決書、（62）傳仁字第0011號判決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30 顏尹謨，1940年7月1日出生，彰化人，因「1970年林水泉等人案」而被逮捕，後經判決有期徒刑15年，褫奪公權10年，實際服刑為10年。參閱自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

統獨問題，他就對我說：「獨派不一定是右派，其中也有左派，左、右派不能用統、獨派來去區分，例如謝雪紅她雖是左派但也主張過台灣獨立，甚至毛澤東也曾經支持過台灣獨立啊！所以誰說左派一定是支持統派的？」像這樣的言論我是第一次聽到。老實說，當時我對中國史比較熟，對台灣史是很陌生的，對政治其實更幼稚。

這裡的台灣人政治犯分成紅的、白的。分派的標準，不是根據信仰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做區分，而是根據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的主張來分的。不過左派通常傾向於主張跟中國統一，右派都傾向於獨立，所以雖然不分左右，而稱紅白，大體上也合乎這個傾向。有不少老前輩，進來是「紅的」，但是後來支持獨立，這種人不被真的紅的左派認同，但「白的」也不一定接納他們，變成游離的一群。

我的思想比較左傾，不過我對台獨也沒有排斥，我願意傾聽他們的想法。所以我兩派都可以聊，都可以做朋友，但是哪一派都不會把我當作是自己人。對於紅的或白的，統一或獨立是一種「信仰」，那是不能被質問、被懷疑的，也就是不必討論的問題，只有認同問題。如果你想討論，只要你提出質疑，那你就不會被當成自己人。不過平常紅的或白的沒有很大的矛盾，頂多是不說話而已。

我也遇到很多外省人，我講的是第一代外省人（第二代外省人跟同代的台灣人比較融洽）。我跟他們接觸之後，才感到他們跟台灣人的思想、個性都差很多。外省人政治犯可以分成幾類。

第一類是高級知識分子，有學問、有思想，不論是反蔣或親蔣都可以討論問題，可以交朋友。台灣人左派大部分是親中共的，但外省人之中，我還沒有碰過親中共的，大概真正親中共的人早就槍斃了，活存的

(57) 初特字第0005、0015、0024、0035號判決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這些難友，其實都是冤枉的，所以見不到親共的，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反國民黨的，有些人認為共產黨的素質比國民黨高。

第二種是中級知識分子，這種人都是被冤枉的國民黨員。外省軍公教人員屬於統治階級，普遍有一種「高級外省人」的優越感。他們的思想比較封建，喜歡談大陸時代的軍閥故事，國共內戰的故事，蔣家宮廷故事，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故事。台灣人不曉得這些，所以他們跟台灣人都談不來，認為台灣人沒有知識。不管口裡說不說，他們大部分從心裡看不起台灣人。他們把李登輝、林洋港叫做「吹台青」，意思是沒有什麼才幹，只會拍馬屁的台灣人官員。

第三種是基層的外省人，相對於「高級外省人」，他們就是「低級外省人」了，雖然沒有人敢這樣稱呼他們。他們喜歡談逃難的故事，在台灣受苦受難的故事，被人欺負的故事，不滿政府，批評政府官員。不過大部分對蔣介石都很忠誠。他們感謝蔣介石把他們帶到台灣，他們認為政治不好不是蔣總統不好，都是下面那些貪官、污吏亂搞。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社會地位都比較低，被高級外省人看不起，台灣人也看不起他們，所以他們心中充滿了怨氣。由於文化的隔閡，有些人也被台灣人欺負過，所以他們對台灣人也沒有好感。

以上三類外省人，只有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台灣人比較有同理心。大部分外省人對台灣人都充滿了偏見。我讀書的時代遇到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很少聽他們批評台灣人，所以我對外省人並沒有什麼壞印象，是入獄之後才感覺到外省人，就算來台灣這麼多年，也沒有真正想要認同台灣這塊土地，「高級外省人」普遍有統治者的優越感，甚至有些「低級外省人」，照樣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剛進去的第一年，我們同房有一位江西人，大概在軍中亂講話，被抓進來關的。他的身材魁梧，天天光著臂膀，現出他的三塊肌，他就是

屬於「低級外省人」的一類，雖然他大概也有初中程度，和其他的高級外省人不能比。

他最喜歡批評台灣，比如說台灣人「島國根性」，心胸狹小，大陸地方大，土地廣，人口多，大陸人心胸開闊等等；他也批評台灣菜不好吃，台灣人連炒菜都放糖，好難吃。總之台灣沒有一樣比大陸好。我有一次問他：「台灣的山高還是大陸山高？」他說：「笑話，當然大陸的山高？」我說：「喜馬拉雅山當然高，我問你泰山高還是玉山高？」他說：「當然是泰山高，登泰山而小天下，你沒有聽過嗎？」我說：「你還滿有學問的，會說這句話。但是我告訴你，泰山海拔才一千五百多公尺，玉山將近四千公尺，是東亞第一高山，你知不知道？」同室有些比較有知識的都贊同我的話。

就這樣得罪了這個老粗。從此他一天到晚碎碎唸，對我指桑罵槐。比如說：「賣屁股的人，整天看書有什麼用？書唸得越多，做的壞事越多」之類的話。起初我不想理他，但是他越罵越難聽，天天罵，有一天被罵到受不了，發火了，就衝過去揍他，兩個人纏鬥起來。事後我就被隔離到另外一間牢房，被戴了兩個禮拜腳鐐、禁止通信。

移房後清靜了許多！因為本來是10個人擠一間牢房，新牢房只有3個人，空間寬闊許多，待起來也比較舒適。

我同房的難友有兩位，一位叫做陳南興³¹，另一位叫做孟昭三³²。陳南興在中國的時候是位解放軍，不知道犯了什麼罪，游泳偷渡到金門，變成匪軍投誠的反共義士，被受安排到處去演講。後來被人檢舉為匪宣

31 陳南興，1944年9月2日出生，廣東潮陽人，因「陳南興發表利匪言論案」而被逮捕，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3年。參閱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網址：<https://twjtcdb.tjc.gov.tw/Search/Detail/13496>，引用日期：2020年4月26日。

32 孟昭三，山東人。參閱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www.twgiga.com/web/ora ng/win.asp?ID=6398>，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

傳，又抓起來。他的人生經驗非常離奇，聽他講在大陸以及在台灣的故事，非常精彩。此外他武功也很厲害，我還跟他學拳。總之牢房裡面也只剩下我跟他可以聊天，所以我們倆的感情還算是不錯。

同房的另外一位難友孟昭三有點「精神病」。他自己說他是孟子的七十三世孫，至於他會被抓進來，聽別人說是因為他喊了「毛澤東萬歲」。牢房裡很多人都是因為喊了「毛澤東萬歲」而被抓進來，比如上次同牢房有一位廣東人，他說他會被抓進來是因為他自願退伍後，有一餐沒一餐的，沒地方住，到山上搭寮住，也被警察趕下來，被抓到職業訓練所關起來，他逃出來，又得挨餓，生活非常困頓。有人建議他說政治犯吃得好，又不用做工，只要他去喊「毛澤東萬歲」，就可以吃好、住好。他真的跑到警察局去喊「毛澤東萬歲！」第一次警察把他當成神經病，把他趕走。他又去喊，警察就把他抓起來，問他：「你不怕坐牢嗎？」那廣東人就回說：「我就是想要坐牢！」於是警察成全他，送來陪我們坐牢。

像這種因為講話而被逮捕的例子也真不少，我還聽過有一位前輩叫曾新生³³的地理老師，他在上課的時候照課本說「隴海鐵路」起自連雲港到蘭州。有學生說：「地圖隴海鐵路是到達迪化，老師你講錯了。」曾新生說：「是是是，中國鐵路現在已經建到迪化了，這是共產黨建的，現在已經跟西伯里亞連起來了……。」班上有位學生的爸是政戰官，這位

33 曾新生，1934年7月12日出生，廣東興寧縣人，因「曾新生發表反動言論案」而被逮捕，據判決書提及「因閱讀左傾書刊，思想傾匪，於1968年11月及1969年2月至5月間，在彰化中學任教時，經常利用授課機會向該校高中二年級第五班及高中一年級第四、九班學生發表讚揚共產理想極高，匪偽建設進步以及反攻無望等荒謬言論。」其被判決服刑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權4年，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而減刑，故實際服刑為5年5個月又2日。參閱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網址：<https://twjtcdb.tjc.gov.tw/Search/S?k=%E6%9B%BE%E6%96%B0%E7%94%9F>，引用日期：2020年4月26日。

政戰官爸爸聽了兒子說，生氣的罵：「胡說八道，共產黨怎麼可能會建鐵路！」於是提出檢舉，把曾新生給抓起來，判了7年，罪名是「為匪宣傳」。

關於孟昭三的案子我不清楚內容，大概也是亂講、亂罵惹的禍。我和他關在一起的期間，他天天喃喃自語，滿口三字經，時不時就罵「媽個逼、媽個逼」，我聽了就煩。我說：「來！叫我老師，我教你寫字，只要寫100個字，我就給你東西吃。」他寫100個字要花一整天。只要他乖乖地寫字，寫完我交代的進度，又不罵「媽個逼、媽個逼」的話，就賞他吃一個餅或是水果。不過他總是寫了幾個字又開始碎碎唸，唸一唸，又開始寫。

我們難友中有一位「堂的」(tông--ê，家門)，同姓洪，叫洪維和，淡水人。有一次中秋節，因為老孟沒有接濟，就買了兩斤月餅送給他，老孟一下子把月餅全部吃光，結果不消化，拉肚子。從此老孟只要見到洪維和就指著罵「媽個逼、媽個逼，給我壞掉的月餅吃。」那是廚房外役剛做的月餅，大家吃了沒事，只有他拉肚子。

平常陳南興對於孟昭三罵「媽個逼、媽個逼」，都不怎麼理會。有一天孟昭三罵人的時候剛好對上陳南興的眼睛，陳南興以為是在罵他，就叫他站起來，說：「你罵誰？」那孟昭三就回說：「罵你！怎樣？」陳南興一怒，就在孟昭三的鼻子上打了一拳，結果孟昭三吭都沒吭一聲，身體就這樣「碰」的一聲，直直倒在地上暈過去了。管理員一聽到「碰」的聲音，趕緊開門進來查問，把他送醫務室。接著追查原因，問到我，我就回說：「我不知道，我在睡覺」，管理員聽了認為我不老實，就把我跟陳南興兩人給銬了兩個禮拜的腳鐐。孟昭三就被隔離到另外一間牢房。真衰，在普通牢房被罵打人，被移到隔離房，現在別人被罵打人，又無緣無故被銬了一次腳鐐。

我就這樣被關在隔離房，直關到離開綠島為止。1975年4月5日蔣介石死亡，第二天蔣經國接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政治犯對蔣介石之死，不論紅、白莫不額手稱慶，但是看到電視上天天播報無知的民眾跪在街頭痛哭流涕，只是露出悲憫的表情，沒有任何人有激情的慶祝，心裡很高興，但是表面上都很淡定。接著，蔣經國宣布全國罪犯減刑，唯政治犯只減刑三分之一。就因為這項「德政」，我由10年牢獄減刑為6年8個月。

仁愛莊時期

有些政治犯在出獄以前必須送到「台灣仁愛教育實驗所」，簡稱「仁愛莊」³⁴ 接受所謂「補強感訓」，也就是「洗腦教育」。我於1977年3月由綠島監獄被轉到仁教所洗腦。³⁵

那時候來上課的人有馬璧³⁶和柴松林³⁷等學者，他們學問都算不錯，

34 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仁愛路23號。其於1954年設立，早期收容綠島新生訓導處送回的女生分隊受難者，或是被判感訓、刑期即將屆滿的政治受難者。1972年改名為仁愛莊（仁愛教育實驗所），1987年改為台北縣團管區司令部，2002年改為台北縣後備司令部。參閱自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二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頁460。

35 據考核表提及洪惟仁於1977年3月24日由綠島監獄轉來仁教所接受補強感訓，參閱自「台灣仁愛教育實驗所新生考核表——洪惟仁部分」，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36 馬璧（1912-1985），湖南湘潭人，1951年來台灣後，曾任教於政工幹校、中國文化學院與輔仁學院（今輔仁大學）等學校，1981年回中國大陸，曾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與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參閱自「湖湘人物——馬璧」，湖南圖書館，網址：<http://www.library.hn.cn/hxrw/xdrw/xjlwrs/MB.HTM>，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胡健國編著，《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台北：國史館，2004），頁229。

37 柴松林，1934年12月12日出生，畢業於法國國立高等研究院並獲得統計學博士學位，其為著名的人口、經濟統計學家。回台後，除任教於政治大學、交通大學等學校外，並先後擔任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新環境基金會董事長與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等職。

像是柴松林他上課都是上一些社會學方面的課，他當然必須講一些國民黨的德政，但他畢竟是學者，不同於一般的政戰官，他會舉一些社會學的統計數字，來比較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比共產黨好得多，在民主國家的表現也不差。比如他說台灣貧富差距可以分成五級，而收入最低的第五級跟收入最高的第一級之間的差距不大，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台灣的貧富差距是比較小的。他要表達的是，台灣因為實行了民生主義，所以才有這個成就。我問說，為什麼不分成十級、八級，而要分成五級？分成越多級越能顯示貧富差距，越少貧富差距就越模糊。他回說，這是社會學一般的標準。因為我不是社會學家，沒有辦法跟他爭辯。

另外一位是馬璧，他講政治思想，主要是批判共產主義思想。他原原本本地從馬克思主義講起，講到發展為蘇聯、中國的共產主義的歷史。他說蘇聯和中國在革命初期，經濟狀況基本上是封建的，根本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是企圖用人工的方式跳過資本主義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但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社會進化階段，必須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歷經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最後才會邁入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說的正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核心問題，他使我更清楚了解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能畫上等號，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的神主牌而已。

我遇到很多年輕人或是不幸被抓進來的政治犯，大多因為反對國民黨，而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以為這個政黨可以帶來嶄新的未來，從而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但是實際上，我們之中沒有人真正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下過功夫，真正理智的選擇。

參閱自台灣觀光學院，網址：<http://www.tht.edu.tw/thtBoard.asp>，引用日期：2015年7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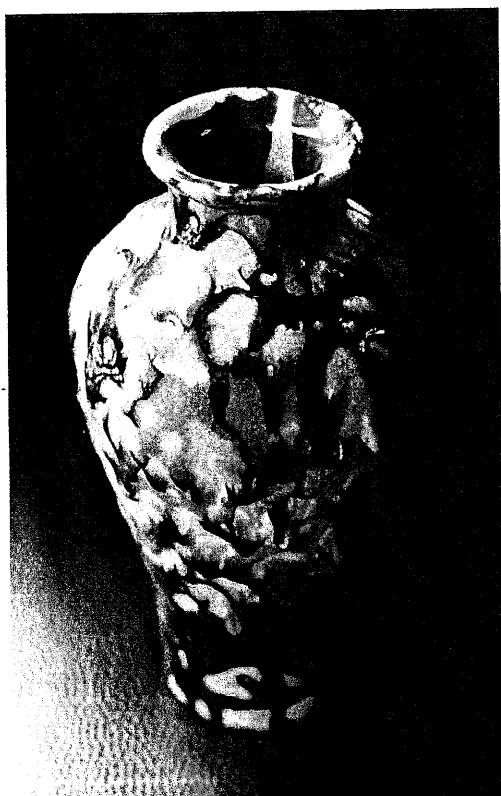
我跟那些左傾年輕人一樣對中國共產黨抱著相當幼稚的幻想，可是後來越來越了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得到政權之後，就藉著革命的大義名份，實施獨裁統治，控制了人民的肚子，也控制人民的思想。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災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理論，純粹烏托邦共產主義幻想的結果。但是共產黨對這個錯誤不必負責，鄧小平當政，實施「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又一百八十度走原始資本主義，更加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四個現代化獨缺「政治現代化」，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拿「社會主義」做幌子的原始資本主義加上中國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更加背離。

出獄以後，我的思想慢慢否定了共產主義，但這不是因為在仁愛莊被洗腦的結果。至今我沒有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即使在仁愛莊

時期，我也沒有完全否定中共，但是隨著對中國的了解、對共產黨本質的了解，我的思想慢慢覺醒，經過1979年魏京生事件，直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我才完全否定了中共，同時完全放棄了跟中國統一的念頭。

仁愛莊時期，除了政治之外，我也學到很多。比如我也學會做陶瓷，我做了很多手工陶瓷作品，部份送給親朋好友，自己手中還流著幾件。我還跟鄭金財前輩學種菜，從做堆肥、掘菜股學起，整套的種菜技術。這裡沒有化學肥料，也沒有農藥，只能種有機菜。我種的



【圖9】洪惟仁在仁愛莊製作的陶藝作品
說明：洪惟仁提供。

菜很漂亮，但是我沒有吃過，因為都是吃免錢的團伙，沒有機會自己炒菜，但是我阿母拿回去炒，說太好吃了。鄭金財是農業專家，頭腦裡很多農業改革的構想。可惜出獄以後就失去聯繫，不知道後來怎麼樣。

星期假日開放親友進莊來接見，我的父母兄弟輪流來看我，我的堂妹瑞徽也常常來。那時我哥哥剛結婚，常常帶著阿嫂來看我。難友說，我大嫂是最漂亮的女家屬之一。

在新店和綠島都沒有見過女獄友，唯一見到的女性是每天來挑澇水的綠島女人，她們都包得緊緊的，也不清楚年齡多大，漂不漂亮，但是只要綠島女人來挑澇水，都會引起一陣騷動，紛紛爬到高高的窗頭，目迎、目送她們來去，腦子裡一面想像著她們是怎樣的美女。

現在不一樣了，假日不但可以見到漂亮的女家屬，我們的政治課，是男女同班，同班也有幾個女政治犯。有一位是彰化縣黃順興議員的女兒黃妮娜。這個女孩子很酷，男生喜歡找機會跟她聊天，但是她都不太理睬。我知道她去過日本留學，我曾經跟她聊天說，出獄後也想去日本，她教訓我說：「不要有這種想法，這是資產階級思想。」

除了黃妮娜，同班的女性大部分是上了年紀的前輩，她們的興趣在找女婿，有些人真的在難友裡面找到女婿。其中之一是徐美前輩看上了我的好友陳瑞麟。他出獄後就真的跟她女兒結婚了。

同班難友中，有一位前輩楊渭溪老先生，他是大家很敬重的前輩，很疼我，教過我打太極拳。他有一個漂亮的模特兒女兒，他很想把女兒嫁給我。他女兒很孝順，每一次來接見，我往往會跟他們在一起享受他們帶來的點心，我跟她女兒也常常單獨相處。不過我家人都不贊成，原因是太漂亮了，他們希望我娶一位賢妻良母型的普通女人。後來這段姻緣也沒有結果，出獄後勞燕分飛，只見了一次面就沒有再續前緣了。

出獄後的生活

從1972年9月16日失去自由，一直到1979年5月17日出獄，除了前面講過當年中秋節（9月22日）學妹拿月餅給我，我哭了一場之外，我沒有流過淚，更沒有想到家裡的人比我更難過、更擔心。

家人的苦是出獄以後才知道的。比如，我剛坐牢的時候，阿母煩惱到失神，有一次回家，在基隆等車回金山，竟然坐錯車，坐到往金瓜石的車去了。我不在的時候，警察每一個月都至少要來我家一次，有一次又來了，警察口氣不好，略帶威脅，我阿爹一氣，摔椅子，說：「阮囡都予恁掠去關矣，無、是卜按怎？」那個警察嚇了一跳，拔腿就跑。後來就比較少來了。

類似的事情我也經驗過。我出獄以後，因為屬於列管人員，警察也一樣每一個月來一次，一直來了好幾年。雖然坐過牢，我並未受到教訓，仍然在報紙上寫文章，批評國民黨。那時已經搬到石碇蓬菜寮了，有一次警察來，客氣的對我說：「寫文章可以，不要亂寫了。」我說：「我沒有亂寫，我講的都是真話。」真是冥頑不靈。我大概也遺傳到阿爹的硬脾氣吧？

我出獄前幾個月，仁愛莊的輔導員有來找我過去，說打算安排我到哪個學校教書，問我的意見。我也聽說有難友出獄，有被安排去就業的。但我一聽，沒有考慮就回絕了。我拒絕的原因，一來是認為當初你把我抓進來，現在又要來摸我的頭，要我盡釋前仇嗎？我覺得不舒服；二來我也怕會不會假安排之名，繼續監視我？我還不知道學校裡面到處是「抓耙仔」嗎？

也許有「假氣魄」之譏吧？但我也慶幸沒有答應，否則一旦接受安排，我怕生活安定下來，安於現狀，一生當順民，那就沒有後來的我了。

踏出牢門

剛踏出牢門，走出社會，眼前一片迷茫，不知何去何從。在那當下，心裡相當脆弱而無助。

感謝家人、好友給我很多溫暖。首先，家是永遠的避風港，父母兄弟沒有人講過怨嘆、不滿我坐牢這幾年給他們惹的麻煩，增加他們的負擔的話。我們家人不習慣講一些肉麻的話，但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愛。我在仁愛莊時，他們常常去看我；出獄後暫時找不到工作，也沒有給我壓力。還有，我的中學同學也辦了一桌菜，給我洗塵、壓驚、去霉運。那是坐牢以來離別6年8個月以後第一次見面，尤其和我一起去坐過牢，一直沒有機會見面的好友羅子玄，現在終於能夠見面了，特別高興。

當然，我也碰過洩氣的事，譬如有一次在街上等公車，遇到一位大學頗要好的同學，那位同學看到我驚訝的說：「你不是洪惟仁嗎？」我說：「是啊！你不是某某某嗎？」他驚慌地搖手說：「好久不見啊！我有事，再見再見！」慌忙地離開。政治犯帶瘟疫嗎？怎麼那麼怕？確實，當時政治犯比瘟疫還可怕哩！像這種膽小鬼其實不多。

出獄後最不習慣的有兩個感覺：首先是路上的汽車變多了，車流比以前多得多，過馬路有點怕，這點很快就習慣了；其次是講華語的人變多了，台語反而不通了，有點難過。這種難過的感覺當下使我決意必須做些什麼，等一下再談。

結婚生子

先談生活問題。雖然家人很體諒我，但避風港不宜久留。我必須快快找到工作。我看報紙應徵了幾家公司，沒有下文。只有一次面談機會，老板看到我的學歷，對我說：「我們只須要大學畢業，你是碩士，做得下去嗎？」還是沒有下文。

回來我陷入沉思，我想我大概也不適宜去當公司職員。心想我的日文程度還不錯，不如去教日文？那時我正好認識一位叫時田博的日本年輕人，我就跟他合作在台大附近租房子，開日文補習班。他教高級日文，我教初級日文。可惜沒收到什麼學生，不到一年就倒閉了。結果我賠了大概7萬塊，不過也因此騙了一個老婆。

那時我已經34歲了，在哪個時代，超過30歲還沒有結婚，就算太晚了。我媽媽和哥哥勸我趕快結婚。正好我阿嫂的大姨在朴子開助產房，請了一個助產士當助理。我阿母自己也開助產房，須要一個助手，剛好「門當互對」。當時我沒有什麼條件挑剔，我只有一個條件，只要是穿裙子的就好。而我老婆也已經29歲，年紀也不小了。就在阿嫂的保證下，我們只見了兩次面，在我出獄的第二年就步上結婚禮堂了。後來我老婆告訴我說她本來打算不結婚的，因為我丈人極力贊成，說什麼「人家學歷那麼高，現在又開補習班。妳還挑剔什麼？」讓她難於推辭。我丈人以為我開一間建國補習班那麼大的補習班，不知道是一間沒有生意的補習班，我就這樣騙了一個老婆。

我老婆也是滿勇敢的，明知我是政治犯還敢嫁給我！我老丈人是鄉公所公務員，當然是國民黨員，一輩子當國民黨的樁腳。但他家裡訂《民眾日報》就看得出來，他其實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國民黨員。他願意把女兒嫁給我，完全不考慮我是政治犯，原來骨子裡根本沒有國民黨。我後來才領悟，以前中南部選舉都是國民黨的票，但是民進黨一組

黨成功，中南部就變成民進黨的大票倉，便是這個道理。台灣人平時隱忍不發，開放民主之後，可以選自己的候選人，就不願當順民了。這是台灣人的「韌性」，但是在他當順民的時候，就被看成是「奴性」。我認為漢族都是這樣的民族性，我相信中國人有一天也會覺醒，發揮他們的「韌性」。

我老婆跟我定婚的時候叫黃美珍，我們1980年結婚，她改名黃美慈。我跟我丈人開玩笑說我是跟黃美珍定婚，怎麼叫黃美慈嫁給我了。翌年生子，我的長子就是後來當小導演出名的洪馬克（Mark Ang）³⁸。

我原本住在台北縣金山鄉，我老婆當了一年多阿母的助手，就搬到朴子去，自己開助產房。在那裡又生了次子。不巧，那時台灣經濟起飛，計程車很方便，鄉下開始流行到都市婦產科生產，助產房逐漸沒落，生意越來越差。在朴子撐了兩年，不得不搬到我的丈人家六腳鄉蒜頭，原因是越鄉下、助產房生意越好。另外，借住丈人家，也可以省房租。

以翻譯為生

出獄後幾年，我一直住在鄉下，反正爬格子的工作很自由，我只要帶著一枝筆，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譯。我最初翻譯兩本英文書，其中一本書名《達爾文》（1979）。1980年起到1987年，我開始自己選擇了一些經濟、經營方面的日文書來翻譯，先在《經濟日報》刊登，賺稿費，後來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又賺版稅。最後我和哥哥洪

38 洪惟仁的大兒子名為洪敦謙，1981年出生，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畢業，2007年成立「洪馬克工作室」，期間參與如《志氣》等電影及拍攝許多廣告作品。2014年至2016年他以《替生》短片贏得48個國際影展參展紀錄，得獎14座。自力舉辦過兩次「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福爾摩沙電影櫥窗」（FFIFA/WOFFF，2016-2017）及亞太影展（2018）。

惟助合作翻譯了後半套《書道全集》(9-16卷，1989)，我先把日文譯成中文，我哥哥再去找引用的古書原文進行校正，並潤色文字。這樣，到1989年，我一共翻譯出版了20冊。

我中學時代夢想當文學家，後來沒有當成，但是卻練就了好文筆；我學日文，純粹是為了興趣，後來我學到會說、會寫。但是這兩樣興趣養成的專長在我出獄後變成了謀生的本領。我做了10年的翻譯，闖出一點名氣，出版公司欣賞我譯筆流暢，沒有一點翻譯的生澀。我能夠讀日文，後來用到研讀台灣日治時代文獻，毫無阻礙，我的英文雖然說、寫不流利，閱讀沒有問題。後來我去唸語言學博士學位，很快就能夠適應英文文獻，我又能參考別人看不懂的日文文獻，對我學習現代語言學有加乘效果。這些語文能力就變成我從事台灣研究、語言學研究的基本工具，比一般中文系出身的學者更有利。

自力研究

前面說過自己剛出獄後發現講台北華語的人變多了，台語反而不通了，有點難過。在我入獄以前，台北市的街上都是講台語的，碰到不認識的人，預設的語言是台語，除非碰到外省人才會改口說華語，電視上一半以上是台語節目；出獄後發現台語變少了，滿街是華語，電視上的台語也變少了。這種現象使我難過、震驚。我開始思考我應該做些什麼。

但是接下來幾年，為了生活，不得不以翻譯糊口。只是一直翻譯別人的著作，覺得自己好像鸚鵡學話一樣，沒有自己。我自覺不是庸俗之輩，為什麼要一直鸚鵡學話，為什麼不能寫自己想說的話？

於是我又重返初衷。1985年我覺得不能把人生浪費在翻譯的工作，決心一個人搬到金山和父母同住，比較接近台北文化圈，而把妻兒放在

鄉下。我開始減少翻譯量，專心投稿、寫書，同年就出版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本書《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自立晚報，1985）；第二年我又調查台灣禮俗文化，出版了《台灣禮俗語典》（1986）；同時大量發表文章，很快地就結集出版《回歸鄉土回歸傳統》（1986），都交由自立晚報出版。《台灣禮俗語典》這本書不只保存了台灣禮俗語言，重要的是我對禮俗語言所下的考證功夫，我考證了禮俗相關用語的語源，並且把本字和合理的用字訂下來。我的用字對後來的台語文字化產生很大影響，它在台語文的貢獻比民俗學的貢獻還多。

1985年我同時開始進行全島閩南語方言的掃瞄調查，我的親戚朋友遍布全台，我便利用拜訪之名，走訪各地親友。那時台灣的經濟已經相當不錯，很多親友都買了車子，他們帶著我到處跑。我重點式地走遍全台，進行台語方言掃瞄調查，我用的字表只有約100個具有重要區別性特徵的詞彙，一個縣，兩天就跑遍了，回來後便把自己的感想與經驗寫下來，刊在雜誌上，後來結成集子出版了《台灣方言之旅》（1992）。這本書引起很大的注意，很多年輕人看了這本書，走進閩南語方言學的行列；我同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了很多拯救台語的文章，後來結集出版了《台灣語言危機》（1992），這本書對台語運動也做出了貢獻；我也寫了許多有關台語文字化、文學化的文章，後來結集出版了《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1992）。以這本書為基礎，後來組織台語社，出版《台語文摘》、《掖種》，對台語文字化運動產生很大的影響，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詞典》很多用字都是我們建立的基礎。以上這三本書都交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後來得到巫永福評論獎（1993），那是我出社會以後第一次得獎。1987年3月我的母親結束金山的產房，搬到龍潭，在我弟弟家附近買了一棟小洋房養老。我到石碇鄉蓬萊寮租了一棟百年古厝，把愛妻、兩個愛子接過來。我半夜寫稿，睡到中午，下午就帶著老婆和才五、六歲的兩個愛子去爬山，或在溪中抓蝦，或在山間散步，晚上在附近的山

路上欣賞滿天的螢火蟲。我們自己養雞、種菜，過著與世隔絕，半隱居的生活。我的兒子說，這段山居生活是他們小時候最快樂的記憶。

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助理

《台灣風物》的主編是張炎憲教授，因為我常常在本刊投稿的關係與我相識。他當時是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中央院新組織一個田野研究室，那是後來台灣史研究所的雛形組織。1988年，張教授邀請我到中央研究院做計畫的兼任助理，負責台語書目的編輯工作。因為這個機會，我才有機會到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看了大量有關台語的研究文獻。

最重要是有緣認識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龔煌城³⁹老師。龔老師本人雖然不研究台灣，但很關心台灣研究，他是田野研究室委員，我們有很多機會見面。龔老師看了我田野調查的文章非常欣賞，問我有沒有興趣進行全台灣的台語調查，我說這是我的興趣，也是我的志業，如果有機會，當然願意。沒有想到他真的向國科會申請到一個名為《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的補助計畫，要聘我為專任助理。那時候，我因為寫了很多文章而出名，被北美台灣基金會邀請到美國各處演講。我說：「可不可以等我回來才上任？」他說沒有問題。

39 龔煌城(1934-2010)，雲林北港人，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後至德國求學並獲得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台北市立大同中學教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等職，並於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與北京大學等校擔任訪問教授，其於2002年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出版有《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等著作。參閱自中央研究院龔煌城院士紀念網站，網址：<http://www.ling.sinica.edu.tw/hcgong/im/biography.htm>，引用日期：2020年2月21日。

於是我立刻決定搬到南港，才安心出國。我不放心把老婆一個女人和兩個幼子丟在石碇偏僻的山野。

我到美國進行了3個半月的演講行程，走遍30州。當時日本同鄉會聽到我要去美國演講，要求我路過東京時順便進行一場演講。我到每一個地方，談的無非是台灣的語言現況，台語的方言分布。我因為進行了台語的掃瞄調查，對台語方言變體分布的情形非常了解，腦中有很多方言地圖，所以大約聽人講幾句話就猜得到他是什麼地方人，準確率相當高。就憑著這個技術，到處受到熱烈歡迎。

從美國回國之後，1988年5月起我開始擔任龔煌城老師的計畫助理，專做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工作。前前後後在中研院做了9年，這期間我有兩個收穫，一是從龔煌城老師身上學到如何進行學術研究，其次是我有機會看遍所有台灣分館的閩南語叢書。

雖然之前寫過很多有關台語的文章，也出過書，但大部分是遊記式的隨筆，不是嚴謹的論文。我進中研院之後，耳濡目染，才慢慢了解學術論文是什麼東西。我寫的文章都會請龔先生過目，他也會很熱心的給我指點。他常訓誡我說，寫論文不能帶感情，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要只想要別人讚美。您的論文發表出來，每一個人都眼睜睜地找你的毛病，所以你在投稿以前必須先找找看自己有什麼缺點，務必要把所有的缺點通通找到，修正了，才可以發表。我這才了解，龔先生嚴謹治學的祕訣原來在此。以後我寫文章也盡量做到龔先生的要求，也有人以嚴謹來誇我，這都要感謝龔先生的教導。但是龔先生做人非常謙虛，不隨便批評別人的論文，即使在研討會上的評語也很客氣，這一點我並沒有學到。不過他和我私下討論的時候會說實話，每一個人他都有評價。他等於是我的語言學私塾老師。

在中研院服務期間，有一段插話，1989年8月至1991年7月間，張炎憲教授主導一個「台灣文獻書目解題」撰寫計畫，邀請我參加。同時

龔煌城老師又替我申請了兩年約聘助理研究員的資格。這兩年我沒有做田野，我利用這兩年看遍了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今國立台灣圖書館）所有的閩南語藏書，我看到很多別人沒有機會接觸的資料。我因此能夠編著《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993）十大冊，同時濃縮成張教授需要的《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1996）。我同時又著作了《《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這是第一部閩南語有史以來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寫成的泉州音韻史的研究，這一部書等於是在龔先生指導下寫成的沒有學位的博士論文，相當於小川尚義在《台日大辭典》發表的〈緒論〉。

在中央研究院期間我也一度接受日本交流協會聘請為「長期聘用專門家」，在天理大學訪問研究7個月（1993年9月至1994年3月），我在天理圖書館看到早期有關漢語音韻學的稀覯文獻，寫成〈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1994）。這篇論文的貢獻是發掘了比高本漢早八年進行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日本學者小川尚義。他的論文因為放在《台日大辭典》（1907），日本人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中國人更無由知道他的存在。他因為台灣殖民地學者的身分遭到被埋沒的命運。我這篇論文發表以後語言學界才認識到小川尚義的存在。我把小川尚義尊為「台灣語言學之父」，之後學術界也接受了這個封號。我當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主任的時候，2007年9月8日至9日我在台中教育大學主辦了一個盛大的「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台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所以選在這一年舉辦，是因為小川尚義《日台大辭典》（1907）出版，到2007年正好是100周年，我覺得這個日子非常值得紀念。會中，聘請專題報告2篇，發表論文22篇，參會的來賓共125人。第一天研討會結束後的晚宴前，我們舉辦了一場「迎賓晚會」，由台語系的學生們自編、自導、自演40分鐘的「蛇郎君」歌仔戲，贏得滿堂彩。他們的歌

仔戲不過是在學校的課程中，以及「台灣戲曲社」的社團練習中學得的，能夠有這樣的表現，也讓與會的學者及貴賓們驚艷（參《台灣語文研究》第四期〈編者序〉，2009）。這個會是台灣語文學會所有舉辦的研討會中，最盛大、最有意義的會。

考上清大語言所

1995年我考上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班。我會去報考博士班是有原因的。中研院每個月都會辦歷史學或語言學相關的講論會，我擔任助理的時候都會去聽。但語言學者的報告往往涉獵到現代語言學的概念，尤其是Chomsky衍生語言學的概念，我都聽不懂。當下我受到很大的刺激，覺得自己落伍了。我就跟龔煌城老師說我想要去攻讀博士學位。龔先生先是建議我考師大研究所，我不要，我說我就是要學現代語言學，只有去考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在應考之前我先去旁聽湯廷池老師的句法學和蕭宇超老師的音韻學，聽了一年。後來考取之後我又正式修了他們的課。對於引我進清大語言所大門的兩位老師，我是深為感激的。尤其湯老師不但在學問上給我當頭棒喝，做人處事上也給我很多啟示，在人生的旅途上也多所提拔。

我原可以以在職班的身分報考，可以加分，但我沒有，我仍然是以一般生的身分報考。很幸運，我還是考取了。但是我的「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還沒有完成，怎麼辦？我抱著取巧的心裡，向龔先生要求說是不是可以讓我去讀書，一面做研究。龔先生說：「不行，這樣你書讀不好，研究也做不好，兩頭空。你還是先把計畫完成，再專心去唸博士班吧！」我聽了龔先生的話，先請了一年假，把調查計畫完成了，再去清華報到。我終於把遍布台灣的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完成了，了了龔

先生和我的心願。如果沒有聽先生的話，把這個計畫放鴿子，將可能是一個大遺憾——學術上的遺憾，以及人格上的遺憾。

隔年1996年我正式去清華大學唸博士班。那年我已經滿50歲了，所有的同學平均年齡不到我的一半。我住的宿舍叫碩齋，第一次進去住的時候，室友看到我還以為我是來看兒子的。我跟我的室友除了第一次入住見面，幾乎沒有講過話，因為我每天回去宿舍休息的時候已經一、兩點，他已經睡了，早上我7點就起床了，他還在睡，因此沒有機會講話。

清大語言學博士班必須修完24個學分，但我不止如此，依規定，離開學校6年以上，碩士班的課程也要重修。我因為沒有修過語言學碩士，碩士班24個學分必須補修，一個不能少。所以我實際上修了48個學分的語言學課程。等於說，我3年修完了碩士、博士的所有必修學分的課程。而所有語言學講義，幾乎都是英文，對中文系出身的我，這是很大挑戰，我差不多一個學期以後才慢慢習慣。因為課程太多，我一天才睡5個小時而已，我是卯足了勁讀書。第一年，因為只知讀書，沒有運動，病了。我覺得這樣下去，身體會垮掉。第二年起我每天去游泳一個小時，身體立刻就恢復了健康。

博士班三年實在很辛苦，但是這段學習歷程對我的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訓練，我在這裡學會了現代語言學。清華大學的教授素質非常整齊，絕大多數是留美回國的年輕學者。他們的年齡，除了梅廣、湯廷池、曹逢甫三位老師之外都比我年輕。年輕教授所教的當然是最新版的美國語言學，老教授的語言學講義也隨時在更新，所以我在這裏所學的都是最新的現代語言學理論，譬如曹逢甫老師的社會語言學，梅廣老師、湯廷池老師、蔡維天老師、湯志真老師的Chomskyan句法學，蕭宇超老師的音韻學概論，陳素宜老師的OT音韻學，張月琴老師的實驗語音學，王旭老師的實驗音韻學，連金發老師的歷史語言學。

完整的現代語言學理論課程，讓我開拓了寬廣、多元的視野，使我日後有能力做出更高品質的研究。如果當時沒有到中研院工作，沒有遇到龔煌城老師、李壬癸、丁邦新等一流的大學者，沒有受到刺激而去讀語言所博士班的話，我頂多是個天才的台語民間學者吧？如果我沒有去坐牢，順利唸了博士，我一步一步地爬，也一定會跟其他人一樣順利地升到中文系教授吧？那我一定不會想到要去修語言學博士，因而永遠不知道現代語言學為何物。我永遠像井底青蛙一樣自我滿足、自以為是、自視奇高、自我受限。現在想起來，似乎一切都是天意。我一生所受的苦不過是一種必要的試煉。

伯樂杜正勝與台羅拼音

我在中研院史語所當助理的時候，所長正好是杜正勝教授，他也是書法家，我向他求字，他給我的賜言是《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他的筆蹟還掛在我的書房「治言齋」。這段話說中了我的心。我和杜所長地位懸殊，私交不熟，但我相信他是識馬伯樂，有故事為證。杜正勝院士後來在陳水扁時代擔任教育部長，被藍營修理得很慘。但他是最了解、最關心台語的部長。他上任那一年，想寫春聯送給教師們，寫什麼「句讀」(kù-tāu)呢？他在網路上找到我作的對聯：「心正萬川歸大海，志堅千指不目逃。」派他的屬下打電話給我，是不是同意他的引用。我每年春聯自己作新的台語聯對，自己寫。連續幾十年，沒有人注意，杜部長居然看到了，還引用我的聯句來寫春聯送全國教師，怎麼不高興呢？

2000年民進黨執政初期，那時的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由余伯泉及范巽綠次長主導。范次長其實不是語言方面的專家，因此整個委員會幾乎被余伯泉主導。部長要提名李壬癸院士當主任委員，因為余伯泉不同意，硬生生被拉下來，我向余伯泉質問說：「李壬癸教授是最公正的人選，為什麼要把他拉下來？」余伯泉說：「因為我們認為他不好。」背後的原因是李壬癸院士不是通用派。後來就推選一位支持通用拼音的台大梁教授當主委。

杜正勝部長上任後，新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單是用打字的，那是余伯泉提出的名單，其中沒有我的名字。杜部長用手寫，把我的名字擠進去，我才能當委員。我進去國語推行委員會之後，情勢不一樣了，我對通用派不假詞色，他們最怕的就是我。那時，一半以上是通用派，四分之一是中立派，沒有什麼立場，當中只有施正鋒是反通用拼音的，剩下5名委員當中，TLPA派3名，教羅派只有2名。以前鄭良偉教授當主委決定華語拼音時，他代表的教羅派與通用派是合作的，條件是在閩南語拼音的表決上通用派要支持教羅，壓制TLPA派。華語「通用拼音」通過了，沒有想到鄭良偉主委也被下台了。於是通用派一把抓，連閩南語拼音也要，完全毀棄承諾。鄭良偉曾對我說，他被騙了。

這時教羅派和TLPA派感受到共同危機，不能不合作起來抵制通用派。策略之一是，教羅派以李勤岸為首，TLPA派以我為首，兩派各推舉6位代表，施正鋒教授擔任主席，做公親。我們只開了兩次會就整合出一個「台羅草案」來了。這個草案原則上韻母採用TLPA方案，聲調採用教羅潤號式，聲調齒音採用國際音標的ts, tsh，的確是完美的結合。另外一個策略，就是我提議委員會以共識決取代多數決。因為如果採用多數決，通用拼音派占絕對多數，必勝無疑，那就不用討論了。既然要討論，那就不能包裹表決，一項一項來，聲母、韻母、聲調，之下再分各種音類，拆開一項一項討論。這樣一來，音韻學理論、閩南語音系非

得相當內行不行。通用拼音派，除了江文渝教授之外都不是音韻學家，江教授本人也不是閩南語音韻學家。所以要討論音韻，通用派完全不是對手。

討論很難進行，又不能表決，卡住了。這時杜部長介入了，他另外請何大安邀請了一群中立派學者組成一個委員會，討論閩南語音標方案。這個委員會所擬的方案幾乎和我們整合的「台羅草案」不謀而合。這樣就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和助力。杜部長起先是傾向於支持通用的，經過這個過程，杜部長對於哪個方案比較理想，心裡已經有了譜了。

杜部長看委員會各派堅持己見，議而不決，就決定由教育部作東，找一個烏來溫泉旅館，大家住在裡面，討論完了才能回來。於是委員會移師烏來，前一天晚上洗個溫泉，輕鬆一下，第二天開始辯論，杜部長親自主持。在理性辯論之下，通用拼音完全招架不住，最後連江文渝教授都倒戈來支持我們。只花了一天，後來的「台灣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台羅」，就這樣定案了。

通用拼音完全輸了。余伯泉滿面豆花，說不出話來。部長要求大家簽名負責，唯有余伯泉拒絕簽名。部長怒言：「你願意來協調，協調已經定案，你又不認帳？好，如果這次不能定案，我也不管了。以後誰都別想利用行政資源來遂行自己的私見。」有人提議說余委員還是簽名，如有不同意見，就把異議的部分寫下來，列入紀錄，表示沒有完全得到共識。最後余伯泉只好答應簽名了。

2006年10月14日「台灣羅馬字拼音方案」正式公告。「台羅」能夠定案，第一個要感謝杜部長的魄力和施教授的協調力。關鍵是教羅派在李勤岸教授的寬宏度量。如果像鄭良偉教授那樣搞權謀，堅持教羅，一點不讓步，執意跟 TLPA 對抗到底，漁翁得利的必然是通用拼音。整個局面就不一樣，直到今天我們可能還在抗議與鬥爭之中。雖然如此，許多白話字（教羅）的老派至今還是不死心，堅持維護白話字，李勤岸教

授當年的寬大被誤解為出賣白話字。但是他淡淡地說：「斷奶嘛愛予伊食一脩仔奶喙仔。」真正是有智慧的話。

從靜宜到元智

我考上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剛好靜宜大學中文系缺人，鄭邦鎮主任請我去兼課。兩門課，一個月也有一萬多元，可以補貼部分生活費，雪中送炭，我是很感激的。

但我是以講師的待遇受聘。當時我已經50歲，我做過很多研究，我自覺學問不差，論文、著作很多，學校用講師名義聘請我，我感覺有點委曲。我向鄭主任提出這個問題，希望用副教授聘任。鄭主任客氣地說：「我了解。但是因為你的最高學歷是碩士，照規定只能以講師聘任。好！我來想辦法。」於是叫我準備資料，他幫我送件。我當時是兼任，又是才剛上任，我不過說說而已，心想有可能通過嗎？出乎意料之外，一路經過系、校教評會，直到教育部審查，順利通關，不幾個月，我就拿到副教授證，第二個學期靜宜大學就改以副教授聘任了。其中詳細過程如何，我沒有細問，推想鄭邦鎮主任一定費盡口舌，折衝鼎鼐，才有可能達成這個艱巨的任務。我終於沒有拿過講師證，直升副教授，這在台灣教育史上也是很少見的。我只聽龔煌城老師告訴我，當初他從德國回國，也沒有經過副研究員、副教授，直接升任研究員、教授。我又得到一個貴人了。但鄭主任從未居功、要人情，只對我說：「這是你的努力，審查委員對你的評價很高。」我一方面對我一直以來認真研究獲得肯定感到安慰，最感謝的還是鄭主任的提拔之功，使我免去好幾年的努力，對於日後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

在清大學習三年，學分修完，資格考也通過了，我老婆接到一通元智大學職員老友王聖宗先生的電話，說中語系徐富美老師在找我。徐富

美這個名字聽過，但是不熟，找我幹什麼？我也不放在心上，就忘了。直到有一天想起來，打電話聯絡到徐富美，她說：「元智中語系正缺一位語言學專長的老師，你趕快送件過來，明天就截止了！」這使我陷入困難的抉擇。因為當時張屏生教授由東京外語大學回來，他在那裡教漢語、閩南語，結束聘期，介紹我去接任。外語大學那邊也答應了，我的資料也送去了，只等正式寄來聘函。我到底去那個大學好？我問哥哥的意見，哥哥說：「東京外語大學是兼任，元智大學是專任，現在專任不好找，當然要趕快抓住機會。」我想也是，許多新博士都找不到工作，我還沒有畢業就有機會，為什麼不趕快抓緊？於是斷然決定去元智，趕快準備資料、email給徐富美老師，徐老師一接到我的資料，馬上列印出來，第二天，正好趕在截止日送件。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被接受了。

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貴人何其多？都是正好在我需要的時機出現，伸出援手。但這次同時出現兩個貴人，撞在一起，反而困窘。我感謝徐貴人，但是對於張貴人我只好得罪了，違逆了他的恩情，對東京外語大學也很過意不去。如果不是這樣撞期，我一定去日本了，以後的事很難逆料。也許我會留下來，因為我會說、寫日語，我在日本教漢語、閩南語應該得心應手，沒有問題。如果在日本得到專職，因為日本教授薪水很高，我可能不會回來了。這樣就會步恩師鍾露昇教授，一輩子流落國外，和台灣斷了根，不可能有後來的我了。我又體悟到，似乎一切都是天意啊！

不過我申請進入元智大學也不是很順利，因為每一個大學都有藍綠問題，尤其深藍學者特別排斥反國民黨的人，我既然有政治犯的紀錄，肯定遭遇到抵制，事實上正是如此。感謝系主任田博元大力相挺，我才能順利過關。總之，我終於能夠進元智大學成為專任副教授，這是我出獄以來第一次得到的專職。

元智大學的薪水很高，除了一般公立大學的薪水之外，每一個月再加3萬元所謂「元智津貼」，如果有研究計畫，有獎金回饋，研究績效好的，又有研究績效獎金。我在元智大學文學院可以說是最認真的，文學院大樓最晚關燈的是我的研究室，春節還進研究室的也只有我一個人。我每一年都得到元智特優獎，每個月加薪約1萬元；連續三年特優，24萬的研究傑出獎，我也得過。這麼好的研究環境，難怪元智大學的教授很少異動。

我一進元智大學，就有資格申請國科會計畫補助。我申請了一個「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調查研究的三年期計畫，對全台灣閩南語的泉州腔、漳州腔、混合腔進行了廣泛而詳細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我利用這個計畫所得到的語料，寫成我的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2003)，開創台灣閩南語的社會方言學研究。這篇論文雖然至今沒有出版，但是廣泛被引用，影響很大。

2003年我拿到清大博士學位對我升教授並沒有什麼幫助，因為依舊制，博士學位只能升副教授，我1997年已經副教授了，升教授不能用博士論文。但這個規定對我無妨，我涉獵的領域很廣，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共時音韻學、歷史音韻學、語言文獻學，隨便抓都有論文。我得到博士學位半年後，以〈台灣話鼻音滲透的OT分析〉(《清華學報》，2002)為主論文，提出升等。有人質疑我的升等論文是博士論文的副產品，但這一篇及其他多篇論文都是音韻學分析的研究。我早就申請外審，回覆的意見都證明我的論文跟博士論文無關，因此我就順理成章地通過教授升等審查。

創立台語系

我原本打算在元智大學退休、終老的，所以在元智大學附近買了一棟透天厝，但我又碰到新貴人了。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2001年即開始實施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列入必選科目，同時鼓勵大學設立「台語系」。台中師範學院也想去申請成立「台灣語文學系」⁴⁰，那麼請誰來籌備呢？徵詢校內台中師範學院陳宏昌教授，校外清華大學語言所曹逢甫教授，也是我的指導教授等，都一致推薦我來籌備，內定為創系主任。當時台中師院的校長賴清標教授也十分有誠意，還親自拜訪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先生請求借調。這件事我是深感榮幸，但我老婆不贊成，因為台中師範學院的待遇遠不及元智，每個月少賺4萬，還要租房子、外食，加上往返交通，一個月至少多花費3萬多元，少賺加多花合計7萬多元，太划不來了。但心想，設立台語系、培育台語人才是我多年來奮鬥的目標，如今夢想就要成為事實了，為了每個月少賺、多花幾萬元，就辭了，說得過去嗎？還有，如果聘請一個外行人去創系，失敗了，於心何忍？

於是我就抱著義不容辭、當仁不讓的心情擔負起創建「台灣語文學系」的任務。我先去義務擔任半年的籌備主任工作。2004年正式創系，創系典禮時請了副總統呂秀蓮來剪綵，中午請一百多位來賓吃台灣小吃。「台灣語文學系」就這樣風風光光地創立了。

但艱苦的工作才剛開始。台語系由零開始，由課程安排、教學設備等硬體到制度的建立，師資聘用、課程安排，大小事情都要費心。還有

40 其於2004年7月正式成立，爾後學校於2005年改制而更名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參閱自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網址：http://taiwanese.ntcu.edu.tw/about.php?get_type=3#mark_1引用日期：2020年2月20日。

每一個禮拜有好幾次的會議；校內外的補助案每一年平均400萬，都由我主持。每天忙到三更半夜，回宿舍前到附近喝杯啤酒、吃點小菜是最大的放鬆。

我最安慰的是學生的學習意願很高，尤其前幾屆收了很多天才學生，不論是學業或才藝都表現優異，老師也很認真指導，每一年參加校外台、客語的語文競賽、才藝競賽都有很好成績，平均一年得到40個獎項。

第一年我就感覺很有成就感，所以第二年2005年台中師範學院改名「台中教育大學」，我就結束借調，放棄了元智大學教職，正式轉到台中教育大學。

但是主任忘碌的生活對我的學術研究是一種阻礙，我的研究成績減了一大半，身體也壞了。我到任不到一年就開始胖了，關節炎、腰酸背痛。這才知道不運動、不休息不行了。後來到我退休的時候，得了電腦手，連回一篇短信都有困難，眼睛酸痛，連一頁書都看不完。

最重要的感到厭倦了，許多表面的風光，其實沒有實際的效果。比如我們辛苦培育的畢業生沒有出路，很多人變成流浪教師，能夠擔任教職的，也大部分是代課老師，即使能夠進入國小，但小學也是包班制，什麼課都得教，他們學的台語專業毫無用武之地。

使我感到厭倦的事情不止一端，許多不必要的雜事令人心煩。當初自以為沒有洪某人台灣島就會沉到太平洋。事實上不是如此。真要爛、真要亡，一手撐不住天塌；命不該絕，放著不管，也自然興旺。我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覺得自己不是當官的料，是做研究的料。

所以，為了找回健康，恢復研究實力。我只做了4年半系主任，2009年初寒假，我就請辭系主任，休假一年之後不久，2011年8月屆齡退休。

退休後，我沒有在任何學校兼課。我先是學做氣功，花了3個月，

不花一塊錢，就把兩年來看遍中西醫醫不好的電腦手和眼睛痛治好了一半，可以看書、打電腦了，從此專心做自己的研究。我申請了一個「《台灣語言地圖集》寫作計畫」，進行著一生志業的語言地理學研究。⁴¹

感想

我一生的故事很多，講不完。我今天講的只限於有關政治受難的前因、後果的部分。還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沒有時間講了，譬如我創立台語社，創刊《台語文摘》、《掖種》，創立台灣語文學會，創刊《台灣語文研究》，TLPA、台羅拼音制定的過程，這些太複雜了，以後有機會再說。

對於我的受難，總結起來有幾點感想：

一、我從小就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從小受的教育，養成自己有一種英雄主義氣慨，不怕死、不怕難、不怕得罪人。立下決心之後，克服萬難，千方百計也要達成。英雄主義成就了我的一生。我總是選擇別人逃避的工作去做，難讀的書去讀。慶幸的，許多立志做的事，都一一堅持、達成了願望，雖然往往弄得遍體鱗傷，或是成果不如所願。

二、我發起革命，也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表現，卻是愚蠢的表現。反對國民黨是出於良心，但是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對中共所統治的中國

41 洪惟仁退休前一年即開始進行《台灣語言地圖集》寫作計畫，花9年時間，於2019年6月出版《台灣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分為二冊，第一冊《台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簡稱CRLT，第二冊《台灣語言地圖集》，簡稱LAT，合稱《台灣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由前衛出版社出版。

完全不了解，明知不可能，卻執意要發起革命，這只能說是愚蠢，完全是不必要的犧牲。我從來沒有感覺自己的愚勇對台灣的民主化有什麼貢獻。

三、起心動念要發動革命，直接原因是受到樊邦弘的鼓舞，而我們兩人都受到王競雄的影響。但我從來沒有怨恨他們，因為我知道我們所有人都只是出於無知與盲目。我甚至對中共也沒有理由怨恨，因為我們的行為是自動自發，並不是受到中共的指揮或陷害的，我們跟中共完全無關。

四、需要譴責的是蔣家為了維護政權所豢養的特務集團。相同的行為，如果發生在今日的民主台灣，不會有任何刑責，但是當年，我們幾個年輕人在室內發發勞騷就要被判7年、10年以上徒刑，人生變調，前途烏有。國民黨倒台、台灣民主化的今天，我們對蔣家政權所有特務集團、特務分子及其司法工具（軍法官、檢察官）並沒有任何懲罰，白色恐怖真相不明，責任未清，也就是說沒有「轉型正義」⁴²。我感覺失望。

五、解嚴之後，政府成立了專案小組，開始對二二八、白色恐怖進行調查，並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給受難者金錢補償。關於政府補償政治受難者，我覺得立意良好，但為德不足，上面已經講了一些。國民黨作的孽，用人民的納稅錢去補償，這有什麼正義？而且當初是我們要打倒國民黨，國民黨當然要把我們關起來，英雄主義地說「我們心安理得」，並沒有想過要補償。如果要補償，只補償坐牢的6年8個月，夠嗎？我自從入獄到進元智大學，中間整整

42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分析，台灣解嚴至今27年，民主轉型空有選舉制度，卻仍未建立政治文化，若白色恐怖真相明朗、社會大眾了解當年威權體制運作情形，就不會出現柯文哲所謂「蔣經國功大於過」的發言。參閱自〈真相仍未明 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明熄燈〉，《自由時報》，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11188>，引用日期：2020年4月26日。

20年沒有固定工作，補償得了嗎？所以一開始我就跟我老婆說不要去領這個錢。但我老婆說：「你不領白不領，誰知道啊！假氣魄！」那時我們在元智大學附近已經買了房子，一半薪水都拿去繳銀行貸款了，兩個孩子都在讀大學，開銷很大！老婆說：「你也要替家裡想一想！」她勸了我好幾次。我熬不過她，一直到申請截止前一個月才提出申請，很快地領了三百多萬補償金，付了近半貸款。

六、牢獄之災幾乎使我「前途烏有」，但是我從來沒有「矢志」。我還是一本初衷，做我想做的事，追求我想要追求的。剛坐牢的時候，我對自己說：「你關我10年，我要討回20年。」和我一起碩士班畢業的同學，他們大概30歲左右就得到博士學位，當上副教授，順利的話大約40歲左右就升教授了，而我50歲才讀博士，58歲才升教授，只教了12年就65歲屆齡退休。雖然擔任教職只有一般學者不到一半的時間，我效法烏龜賽跑的耐力，最後還是升到教授了。在研究方面，我也花了比別人更多的努力，我翻譯的書20冊，編著20冊，著書20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多篇，這不是一般學者做得到的成績。就學術研究而言，我可以說是後發先至。這完全靠自己的毅力、努力與精力。我感到我所以能夠做到，除了天性的或養成的英雄主義個性，人生的挫折與苦難是必要的試煉。所以我對自己的牢獄之災，沒有怨嘆的理由。

七、個人的特質只是內在的因素，我必須感謝一生中遇到的許許多多的貴人。除了家人的支持之外，老師、朋友，或甚至不認識的人，在我困難或需要的時候適時出現，給我指引、支援、提拔。給我機會，或讓我突破難關，順利前進。沒有他們，我再怎麼天才、英雄，也壯志難伸，無用武之地。

八、我不是一個可愛的人，我雅不屑於奉承、討好，我也不太清楚做人和做學問的分際，也不太體會被人拋在後面的人需要安慰、鼓勵。我要求完美以及直率的個性得罪了很多。這實在是我人生的遺憾，有

些人不諒解，但慶幸的是，我周邊的人大部分都能體會我的真誠，容忍我、原諒我。俗語說「人咧做、天咧看」。但我覺得不是「天」在看，是「人」都在冷眼旁觀，看你做了什麼？值不值得幫你？所謂「德不孤」必有貴人。感謝我的貴人們沒有計較我的「白目」。

後記：本文初稿經過洪惟仁本人過目、修正。註腳文獻資料及受訪者簡介與本篇摘要由游淑如所加，圖片主要由洪惟仁提供，大部分由游淑如翻拍。